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

II

无产阶级闹天宫

(下)

La classe operaia va in paradiso

目 录

- 计划国家的危机（1971）**
安东尼奥·奈格里 (1)
- 政府做老板 工人也能反（1972）**
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厂工人自主大会 (29)
- 妇女与社会翻转（1972）**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61)
- 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1974）**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 (115)

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1974）

塞尔焦·博洛尼亚 (133)

附录

理论术语注释 (163)

重要人物、组织、刊物、政党注释 (173)

编后记 (197)

计划国家的危机（节选）

安东尼奥·奈格里

Crisi dello Stato-piano:
Comunismo e organizzazione rivoluzionaria

Antonio Negri

发表于《工人力量》第四十五期，1971年。

4、作为革命主体的劳动： 共产主义蓝图与无产阶级占有

我们在这里想要显示的是，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关于革命进程中一切中间道路的想法现在都是落后于潮流的、阶级斗争的枪口现在已经直接指向了国家。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一趋势的运动内部来展示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对于明确我们的组织模式和组织与计划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通过脚踏实地的分析和对普遍性的联系（但不仅如此），对革命历史主体的发展进行理解与扶持。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在《货币章》（Chapter on Money）^[1]中所提及的那样，重新对这种趋势进行探讨。这一运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它所显示出来的方向是什么？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中，单个人的劳动以特殊劳动作为开端：为了得到货币，这种劳动必须经过媒

介以获得一般性，而执行这种职能的恰恰是货币。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特殊劳动与货币的一般性的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可以由货币本身而解决。因此这里的货币所扮演的是一种生产性的角色（productive role）。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将其与第一种情况区分开来说，“前提本身起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的前提是作为生产基础的共同性。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而且“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而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2]在这里，这一基本矛盾就变得明显了起来：货币的职能变成了阻碍性的（antagonistic）；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它的媒介的或现实的或生产性的角色就由多种因素所决定。于是：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将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这种要求不再能够提出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

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3]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从手工工场（manufacture）到大规模工业（large-scale industry）的长期发展，资本是如何从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一阶段或第一种情况那里实现跨越的。在1929年的大规模危机之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从这一点来说，由于资产阶级控制了一般的交换价值，而后者在一个被认为存在矛盾的关系中起作用，我们就看到了资本赚取货币的暧昧而模糊不清的尝试。

终于，我们今天正在见证这个第二阶段的全面呈现：就在此时，对这一矛盾的神秘化、与过去相关的连续性要素都已经被消耗殆尽了。“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也就发展的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4]

而到了今天，劳动不止在物质上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一般基础，它还被下文明确地表述了出来：

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它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潜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5]

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现在所到达的道路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一样，处于上述的第二阶段。这一倾向的运动有好几个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9年的危机时，或者不如说是在应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十月革命时，这一倾向作为一种摧毁工人组织的外部环境的手段而转向大规模生产之上（就国家而言，1929年的危机使其承认并开始设想这一真正的运动）；从这一点而言，生产的基础开始转变成了一般的劳动。生产的社会属性使产品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的产品。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条道路中，对1929年之后资本与国家的重构所做的神秘化努力都已经消耗殆尽了。从工人的视角来看，工人阶级与作为控制工

具的货币之间的这种由计划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角色，现在都已经被认为回归到其本质：一种纯粹的伪装、一场骗局。马克思用下面的语句预见到了这一最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路：

如果竞争使工人能直接同资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而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6]

这意味着，这一趋势已经包含了革命的历史主体的运动；随着对交换价值神秘化的消失，这一趋势的对立性（antagonism）指出了一条从工资斗争到为占有（appropriation）而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此外，如果这种认同已经发生，那么对社会主义的神秘化也就崩溃了。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就好像任何

不仅仅包含劳动与交换价值对立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行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只能充当资本主义对业已出现的对立的全面掌控的意识形态烟幕而起作用（就像它在 1929 年大危机之后的一段短暂的时间中所做的那样）。

在这个新的情境下，在雇佣劳动的统一基础之上，关于交换的恶名昭彰的假象的本质已经得到了揭露，共产主义就变成了必要之物，它既是未来的目标，也是对现在事物状态的颠覆。这一趋势创造了这种反抗的术语：对于“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7] 这一倾向反对的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然而，对这一从该倾向中出现并在其中寻得解决办法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劳动的性质的方面——即社会劳动内部一切性质差异的瓦解。这种雇佣劳动的统一构成（constitution of unity）还与劳动表现的数量方面相关，并使前者消失；而这又反过来带来了另一些对立。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对劳动时间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明显是十分基础的，但是他在劳动分工的消失方面的观察也应该加以重视（他对这方面的讲述既有隐晦的暗示也有

明白的论述)：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9]

随着劳动时间的缩减，科学被融合进了当下的生产力：“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10]正是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独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所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11]随之而来的矛盾既是一般的，又是特殊的。首先，其一般性在于，资本在面对这一状况时，“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其次，我们看到了劳动生产力的定律：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

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是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2] 于是，这一矛盾被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所引起，相比其本身而言，其后果所蕴含的意义更加重要。在这里，这一矛盾再次显示了该趋势中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显示出这一点的不仅是它的一切对抗性活动（antagonistic activity），即对整个系统进行颠覆的积极可能性；它还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主体，后者正在以一种社会的、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建构。首先，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活动：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13]

其次，这是一种重构的活动，表现为共产主义的现实与现存的（real and present）可能性：

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Naturgegenstand）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Objekt）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劳动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

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14]

在这个时候，在这一趋势的现有成熟和扩张水平之下（我们必须将前者作为事实加以承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下的、关于阶级构成决定论（determinacy of class composition）的革命组织问题的初步结论。劳动力的交换不再是某种在资本过程（process of capital）内发生的、具有确定数量和特定性质的事情；而取决于社会需求和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的交换现在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性是生产的基础。单个生产者的劳动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劳动而表现出来。于是，这些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就不能用交换价值所表示，甚至不能用一般劳动和对前者的一般控制之间的比例媒介的形式来表示，同样也不能以资本主义计划的形式来表示。工作这时就已经变成了对财富界（分配）的直接参与。对这一点的承认就提供了组织的必要程序性

内容。它建立了我们必须建立的理论与实践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发展源头是直接占有（direct appropriation），其实际作用是充当对生产的社会条件的认识。现在，工人组织蓝图的主要内容只能以一种对社会生产出的财富进行直接社会占有的计划为基础，这是因为这种蓝图已经扩展到了抽象劳动的全部范围之内。

工人的占有代表了对这些的实践认识。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资产阶级对财富占有的阻碍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而历史中的一种新革命主体现在可以开始承担通过斗争、通过其自身的特征，而使共产主义发扬光大的重大责任。

7、反对企业控制：

工人阶级新构成内的反抗组织

我们现在要转而根据早先对资本的新构成所做的调查结果来讨论组织的问题。我已经反复说过，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讨论来探索能够带来新的纲领性可能的组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前者就是发现能够决定反抗意愿与反抗对象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组织，而所谓的重要意义在

于验证我们观点的“客观性”。为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对组织问题的通常立场上进一步前进。然而，我们不应该抛弃组织与资本构成（composition of capital）之间的关键关系，这样做首先为理论提供了消极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一种应当被推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即将资本确定为直接的敌人，对抗的目标）；而其次，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由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所建构的、位于资本构成内部的指示物——也就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拥护，这样就在确定物质关系的意义上为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支持。

现在，关于这一计划，我们已经强调过由群众对占有进行管理（the mass management of appropriation）的问题。与自治是对抗计划国家（Planner-State）的阶级行动的决定性特征一样，占有是对抗企业指令（enterprise command, *commando d'impresa*）、对抗负价值状态（state of un-value / disvalore）的阶级行动的决定性特征。所谓计划国家，是建立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明确的一般比例之上的。而通过占有的过程，革命的历史主体以全新的形象将其自身展现出来，它是被同时转变为共性和个性的抽象劳动，它是对后述观点的认同——生产形式正在日益由一种生产过程中诸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

(contradiction) 状态转变为对立 (antagonism) 的状态。因此，这一蓝图（在资本的现有构造之下，也因此是在现有的阶级构造之下）有必要也必须在普遍占有 (generalized appropriation)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在群众管理下把社会财富视为一种应该被视为属于我们的东西而进行总攻击。这样，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个体就会认识到，现有的生产模式只不过是限制其发展可能性的枷锁，而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现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所有具有这一层次自觉性的人以及那些在此基础上推进、鼓动和领导群众的占有行动的人视为革命组织的骨干。以占有为目标的行动现在必须被视为是这一蓝图中通常的、连续不断的和近期的运行范围；这是一片装点着战术行动的地平线，它们会重新构建一次普遍的、大众化的起义。

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只不过触及到了论证的一个要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形势的特征不仅包括了大众化的无产阶级形象的出现，还包括了在这一出现过程与剥削的企业制度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果组织将其自身单纯地局限在前一层次，那么它在战略上就是盲目的、必然要迎来失败；而更重要的是——辩证法永远都是这样摇摆不定——组织会受到改良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机会主义的一切诱惑。当

然，占有本身是与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支配形式相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是早已见识过，以企业为形式的资本是如何精密地发展出一种能力，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渲染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并逐渐将其削弱、然后用它们自己的那一套循环论证和稀泥式的话语来消解掉吗？现在，在特定的情况下，“官方工人运动”（Official Labor Movement）的改良主义是愿意接受这种“善意”批评的，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就是虚假的自觉性。因此，革命蓝图中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就是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与资本以企业的形式对生产方式进行的支配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的评价。在这一关系中、在这种互相作用之中，资本通过暴力来保障其能够生存下去；资本只有在这种政治构造之下，革命意愿才能够推行下去。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多元决定现象（这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的控制和对这种多元决定的特征的把握），那么就不能说这时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就此而言，需要再一次认识到企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引导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市场）的劳动力和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之间不再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平衡。这种关系尽管仍然有效，但不再能够维持先前所提到的比例了；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企业指令在危机时所展现出来的暴力性，此时这

种暴力性还会发生持续的重塑。

清楚地说就是：暴力构成了人际关系的通常状态；暴力还充当了生产力进步的钥匙。因此，这种谴责的矛头不应该指向暴力的常态化，而是应该指向下述事实：在资本主义以企业形式进行支配时，暴力失去了全部内在的、“天然的”合理性（这种“天然性”总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以及一切与进步的关联性。如果有哪里还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企业形式的暴力恰恰与前者所描述的反相：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其中交换价值一直被强加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上，而交换关系的条件在这种社会关系下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暴力是上述非理性的一种精密形式，而其内涵同时却陷入了重重危机。

企业与其智力活动，这就是我们每分每秒要与之搏斗的敌人，是我们每次行动之中要与其斗争的对手，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仇恨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期望都应当为此竭尽全力。对企业国家（Enterprise-State / Stato-impresa）的进攻必须向前推进，然后还要对农场（企业由此建立对阶级的控制）发动同样的进攻；这种进攻的形式应该是充满智慧且恰到好处的，这其实是在复制资本主义工厂中革命组织内部的有效形式。占有运动的每一次行动，无论是自发的、半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因此都应当

被转变为对资本主义支配地位（资本利用这种地位通过精妙而坚定的进行回应而实现再生产）的猛烈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使组织过程走向成熟，上述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在现在的政治构造下所需要的纲领性道路。立足于在（资本主义的）循环内描绘和建构工人运动的旧视角现在必须被新的行动所取代，后者着眼于以资本主义压迫（这些压迫现在以企业为表现形式）中的这些关键时间点为目标发动无产阶级的每一次进攻。前述的循环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与企业形式的发展已经互不相容。我们可以这么说，控制已经不再施加于作为整体的阶级运动的层面上，这种运动已经被引导到了一种调和的立场上去；而事实是，控制措施是垂直起作用的，其作用点恰巧能够阻碍一切运动的发生。因此，从工人的视角来看，这种计划没有足够的施展范围以发展壮大；它已经不能依赖一种有机力量增长。相比之下，（我们的）计划由于缺乏广度、就必须极大地加强强度，由于缺乏复杂度而必须加强密度。这样，不将暴动视为最终任务，而是将其当成是革命进程的第一步，就不再是像共产国际的激进论文那样的某种野心过于庞大或者过于书呆子气的看法了；这种看法就成了对资本崭新构成的一种正确、清醒的理论启示；这一计划就是针对以企业为形式对生产方式进行支配这一模式的颠

覆行动。从唯物辩证主义的视角来看，在面临无产者个人的交换价值被人为压低的不合理局面时，暴动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此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在考量了计划的内容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与上述议程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组织的形式。我们已经知道，前面所说的、根植于阶级的政治构成的这一计划既需要群众、又需要在最前方起带领作用的先锋队。革命时期（我们即将经历这一阶段）行动计划的特殊性就蕴含于这种两极（即群众与先锋队）之间的调和之中、蕴含于对群众占有行动的鼓动之中，这种行动加以积极地引导就可以演变成暴动。组织的形式必须对这种两极性做出反应，这种（革命过程中的）元素的二元性就构成了整个计划。先锋队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代表并引导群众反对企业、反对工厂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实施占有行动的意愿。这两个元素决不能分离，也决不能混为一谈：在整个运动中，它们二者都必须同时存在，分别扮演其特定的角色，并通过先锋队所领导的暴动来不断改进、重组。任何将这两个革命元素分离开的行动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单独由先锋队发动的行动是空洞的；单独由群众组织发动的行动是盲目的。但是如果谁试图将这两个元素混为一谈、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群众先锋队，这

同样是危险的。在我们现在所处阶段的前一阶段，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目标还是提高工资水平的那个阶段，先锋队很难不被群众运动所迷惑，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方式是资产阶级的控制特点相适应的。然而现在，这种（群众与先锋队）功能的二元性已经很明显变得十分必要了。同时，两种功能的划分并不会产生（革命）元素的相互隔离和相互妨碍——既不会产生时间上的隔离、也不会发生逻辑关系上的隔离。这两种革命功能的的同时性与资本的镇压和生产两种职能的同时性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有一支善于斗争的先锋队，它们能够与新的群众组织建立有效的联系、还可以将总的运动集中起来、将它向前推进以发起暴动。

无可否认，在组织的现实过程（尤其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阶段）中，对上述模式的僵硬运用会像以前一样面临走向机会主义的危险。这里我说“像以前一样”，是因为没有哪一种模式会在内容上超出实际的阶级斗争，而这一斗争是我们学习经验的唯一源泉。特别是现在，需要用力地去踏动主观能动性的油门，让它向着先锋队组织的正规化和集中化进一步前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使主观意识中的先锋队^[15]从关于人身自由和阶级自发性的预设立场中解放出来，而这两者虽然在工资斗争中至关重要，

但现在却有抑制运动发展的风险。

现在，对于这些元素来说面临着一场艰难而迫切的战斗，它们需要反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但是我应当补充的是，我们在建立组织的过程中还应该意识到另一种危险，那就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危险，以及那种切断组织与无产阶级政治构成的内部动态变化之间一切联系的态度。在社会大工厂的这片丛林中，先锋队可以在受剥削的群众重新集结起来的地方周围建构起暴动斗争的焦点。这种可能性将被组织起来；采取明智的斗争策略的、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先锋队必须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并在群众组织中得到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正在重新获得许多革命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刻画出了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架构。特别要说的是，我们正在再一次向着先锋队与群众、党和群众组织的联合而迈进，而这种联合正是我们的计划和组织形式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我们也在重新发现暴动中这两个元素的协调同步。对于新革命骨干中的民兵们来说，1917 年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在那种历史阶段下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主义是某种全新的事物，这是由于它试图确定一种对全新计划蓝图的全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以下我们当下的阶级构成为基础的。

对我们来说，组织的联合不应该局限于发展的矛盾之中，而是应当存在于作为一个统一阶级的无产者和凌驾于它并一直压迫它的价值规律的对立之中。组织的联合通过两条道路而得以实现，其一是群众为实现占有这一目的所施加的压力，其二是先锋队针对资本主义企业所采取的行为所发动的攻势。既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工资，而是反对工作：这构成了新革命组织的积极联合。

9、我们的迫切任务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倘若考察各种机构（工会、民族国家等等）在工人和资本的关系间如何运作，势必引起一系列异常广泛的问题。而我只会限于稍微（但却是必需）谈一下这些机构起到的新作用，以及它们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特殊且根本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与企业及其指令形式相关的机构来讲，它们的相对自治关系终究瓦解了。我们应该考察这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并聚焦于工会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我们手中最便利的案例。在计划国家的危机中，这些机构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

对于这两种机构来讲，由于再也不可能在斗争和发展之间保持有序适度的关系，它们在与个别企业的关系中，失去了过去一切相对自治的表象。这些机构曾令人困惑但却有效地充当了各要素间的中介者。这在现如今走到了终点。就工会而言，首先是其在劳动力售卖中的中介功能消失了，此后它只是作为财富总分配计划的一个机构要素而发生作用；就民族国家而言，即便在国内，它都丝毫不能保障在各要素间关系稳定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发展。

企业指令形式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摧毁了一切使国家和工会稳定、持续或连贯地发生中介作用的相应基础。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清除了一切对这些要素而非企业指令的多元决定本身进行衡量的有效基础。这些机构的存在受到政治危机的纠缠；它们的作用陷于使结果变得极为多样和矛盾的不定状态（precariousness）。这是资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以获得将整个运动予以清除的自由（由此，就资本主义存在的稳定方面来讲，这种自由成了一种不确定原则）。

我们可以由此做出进一步的讨论。这种威胁国家机构运作的_{不定状态}，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驾驭资本的限度。这一进程起初所见的是完全在资本中的工人阶级，如今看到的却是完全在工人阶级当中的资本。正是在这种状况

中，资本机构的存在陷于不定状态，它们的中介功能也消耗殆尽。资本的战术与战略之间迄今只在极其严重的危机状况下才会显而易见的裂缝，日趋成为资本存在的常态。“社会主义”及其战略计划的危机中的企业理性与战术密切相关。这种从计划国家到危机国家的转变（由于危机和重构并存，这种转变也采取企业—国家的形式）如今变成了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组织现在不得不发生转变。

显然，就此我们必须明确拒斥，某些对阶级观点抱着不可救药的乐观态度的人所提出的纲领。他们仍然认为，如果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确实已经发生了倒转，那么就长远来讲，我们将看到工人利用资本的新形式被创造出来。这意味着，仿佛资本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服从，并未怀揣参与对那种现实的多元决定的意愿；仿佛随着资产阶级的独立变得越发明显，资本的暴力没有表现得日益自由和残暴。当说到危机国家和危机资本时，我们正确地抓住了危机，抓住了老板们的弱点，抓住了战略与战术的最终分裂；但我们也必须记住，资本与国家忠于自己的本质，它们运行的目的是通过压迫和破坏来扭曲各种力量之间显然不可调和的关系。总是能找到一个科尔尼洛夫来反对革命的——而且他也并非不可避免地总要被击败。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身组织任务的紧迫性，不应该被看成缺乏耐心，或主观地迎合心愿。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资本家复仇心切变得越发明显；第二，趋势表明，在其结构中，产生了一种被刻意地造成对相关各方均变得暴力和不可解决的对抗；尤其是第三，斗争机制表明，工人热切地希望获得一种与资本的垂死挣扎相匹配的颠覆手段。所以让我们像自治高涨年代里所做的那样，再看一看这些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会看到，从失败中产生的不是顺从，而是日益增长着对老板以及代表他们的整个装置（apparatus）的仇恨。但这种仇恨，这种面对占有行径的积极态度，这种互补地、持续不断地坚持行动，日益集中并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非理性工厂来加以反对——所有这些都要求（实际上被认为对于阶级构成来讲是必要的）组织，即对工人颠覆资本主义权力组织的企图予以反制的能力。群众自身行动的重复的、差异化的和暴力的自我表现预示了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向我们昭示的，不仅有紧迫性，而且还有组织模式，即先锋队将运动导向有效权力支点的可能性。

在这一进程中，起义是当务之急。我们说的是“起义”而非“革命”：现在重要的是对资本明确地为着瓦解无产阶

级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动员展开斗争。这里存在的不是先锋队失败或为自由而牺牲（liberatory sacrifice）的思想，而是认识资本的作用结构以及工人阶级真正的需要。革命是这样一种进程，在其中对老板们的国家，实现了一系列暴力的和被暴力地组织起来的永久回击。组织必须能够致力于促进建立在企业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定状态，以使这种关系难以为继、瓦解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并确实地避免现在不仅不理智而且迅速陷入荒诞的资本主义权力。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起义”而非“革命”，因为革命重新组织起这样一种曾凭自己的力量摧毁了整个权力装置的进程。我们用这个词也是为了反对一切在运动的退却和群众阶段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那些“工厂游击战”理论：他们之于当前的任务，正如工场手工业之于大工业一样。

所以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动员起一切能够使组织实现上述目标的机制。作为我们自身基础的分析，其在方法上源于经典，即马列毛著作。在我们的组织中，没有缺乏耐心或迎合心愿；我们正在群众运动中，科学地（因而实践地）理解其构成和意愿。我们所面对的，既有国家及其暴力，也有将自身本质发展为交换价值、剥削和危机的权力的非理性。我们必须立刻把握革命进程的复杂路径，把

握继续并规定着革命进程本质的阶级的内部变化。“列宁在英格兰”对于我们来讲再次成为现实。

朱剑、Karl Yanx 译

[注释]

[1]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 手稿）》，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79、1980 年版。

[2] [3] 同上，第四十六卷上，第 119-120 页。

[4] [5] 同上，第 253-254 页。

[6] 同上，第四十六卷下，第 96-97 页。

[7] 同上，第四十六卷上，第 109 页。

[8] 同上，第 104 页。

[9] [10] 同上，第四十六卷下，第 217 页。

[11] 同上，第四十六卷下，第 218 页。

[12] [13] 同上，第四十六卷下，第 219 页。

[14] 同上，第四十六卷下，第 218-219 页。

[15] 即自认为是先锋队一员的个人。

政府做老板 工人也能反

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厂工人自主大会

Diario operaio della lotta

Assemblea autonoma dell'Alfa Romeo

1972 年。

这是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的工人们在续签合同过程中记下的从1971年11月到1972年2月的斗争日记。当时意大利有五间阿尔法·罗密欧的工厂，这里的故事发生在位于米兰的两间——波特鲁（Portello）厂和阿雷塞（Arese）厂。两间工厂当时都有一万九千名工人（包括办公室文员），每三年谈判一次新合同。两厂当中，波特鲁厂是老厂，没剩几个生产部门，大部分经营活动很快就要转移到阿雷塞厂。厂里的多数工人年纪较大，因为长久以来的斗争传统，仍然受着工会主义的束缚。阿雷塞厂则是新厂，尚待完工。这间工厂聚集了大部分生产部门，工人大都年轻而缺乏工会传统。另外，65%的流水线工人（非生产部门则有25%）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自68年以来，工人阶级的这个部分已经站到了斗争的前线，因此在阿雷塞厂的斗争性和动员力都较强。

这份文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治大会”（Autonomous Assembly，简称AA）的激进份子出版的。他们认为自治大

会是一个“基层工人的组织，希望能成为供工厂里所有工人借鉴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为未来建立革命党添上一分力。”在为时四个月的斗争中，自治大会的目标是成为全体工人的一个持久的政治参照标准，并且从工会干部和意大利共产党手中夺回斗争的控制权，以此取得“和群众对话”的地位。

这个故事的可贵之处在于记录了斗争的多个侧面。在阿尔法·罗密欧厂，工人所对抗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官方把它定义为一种“政府参与”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完全国有的。这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解释了意大利共产党鉴于自己将来可能参与政府里的新的中-左联盟，而被迫“很负责地”通过 FIOM（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五金工会）来行动。它也解释了工会干部采取的吸收并同化（co-optive）的策略，把工人提出的更为激进的要求缓和下来的企图，尤其是他们要把车间代表会变成控制普通工人的手段的决心。这里记录的斗争日期十分重要：故事发生在 1972 年续签全国合同之前不到一年，它充当了老板和工会的试验田，借以判断工人的战斗水平，以及在短短几个月后的新一波斗争中可能会发生什么。

当时阿尔法·罗密欧的激进份子的主要目标是动员工人向公司的职位分类（职称评定）架构发起进攻，迫使管

理层予以改变，以适应大规模汽车生产的客观进程。这也意味着向构成整个职称评定制度及其内在选拔机制的基础的资本主义逻辑发起进攻。因为这个选拔机制不是按照工人的实际技能（它的基础已被大规模生产所破坏），而是工人对管理层的权威、目标和价值观的服从程度。（正如自治大会所说的：“你被‘选中’，不是按照你懂什么或者你会做什么，而是按照你愿不愿意溜须拍马。”）

激进份子于是提议，将组成公司的职称评定架构的六种级别（category）换成四档分“类”（four levels of “classification”），在工人代表会的监察下，让工人（按照工龄和意愿）自动升级。他们也为办公室员工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文件表明，只有部分要求兑现了。“档”的概念被采纳了，从第二档自动升级到第三档也获批了，但是“升迁”的过程仍牢牢地把握在管理层的手里。然而即便实际成果微不足道，但围绕着这项重要诉求的斗争起到了把大部分工人动员起来的作用，并且推进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工作的抗争。最后，这份文件的价值在于呈现了工人每一天创造出来的具体斗争形式，工人预测主管们和工会的下一步行动的能力，以及他们成功分析了自己的斗争的更广泛的政治意义。

11月12日（星期五）

工人代表会今天决定，下星期罢工六到八个小时。工会和激进的先锋份子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之争。工会想把权力赋予执行委员会，决定罢工多少个小时以及采取哪种方式。尽管这条路线被否决了，工会依然成功地把罢工限制在六小时。激进先锋份子则倡议至少罢工九到十小时，并且以更单刀直入的方式进行罢工，譬如设立罢工纠察线、在厂内游行等等。工会的路线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认定现阶段部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处于低潮：现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最好是适应它，千万别超前了……（工会的“消防员”习惯了灭火，以至于现在即便没有火，他们也要泼冷水。）身为自治大会的成员，我们也没多乐观，但我们觉得，如果现实真的就是那样子，那么我们首先要努力分析和理解事态，然后透过更广泛、更强有力的动员来尽力改变它。

11月15日（星期一）

今天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罢工。

在波特鲁厂的食堂召开了一场工人大会。UILM（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五金工会）的一名干部发了四十五分钟的言。

没人听得懂他想说什么，大家都向他大声喝倒彩。正当工人开始否决时，FIOM 的代表到场，并宣布了一项让大会炸开锅的通知。“管理层，”他说，“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无法发工资，因此给每位工人发五十元，而不是往常那样的双周工资。”一位同志马上夺过麦克风大喊：“咱找管理层去！”一支队伍立刻拉起来了，朝行政部门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大楼进发。一群人长驱直入总经理办公室，大吼：“卢拉吉，你这个法西斯，头号法西斯！”当罢工将会继续的消息传开来，队伍闯进了每个部门和办公室，把大家都拉了出来。连平常拒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在得知自己拿不到平时的工资、只能拿到五十块的时候，也离开了岗位。工会“消防员”用呼吁“民主决策”的办法来极力灭火，但没人听他们的。许多部门一整天关门，大批工人回了家，包括那些来轮第二班的工人。

在阿雷塞厂工人大会上，另一名 FIOM 的干部带来了减薪的消息，这下天可塌了。在一片叫喊、嘲骂和全场混乱中，这个干部极力解释：“同志们，这是厂方算好的一步，我们不要被激怒。我建议搞个代表，派去……”和管理层交涉，无疑他是想这么说；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上路了，我们所有人，全体一致。去你的代表吧！工人长长的队伍向着行政部门的办公室进发，拳头高举，我仿佛置身于十

月革命时期的圣彼得堡。我们大约有五百人，围住其中一个主管，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要钱，现在就全部付清。”与此同时，楼下的窗外正在举行集会，决定如何继续斗争：“一起游行到米兰！”“一起继续罢工一整天！”但一个工会（FIOM）的提议再次通过了：“大家冷静，同志们。斗争不会在今天结束。大家理性点……”罢工在下午一点结束。所幸这项决议只被部分地执行：装饰部和打蜡部在当天继续罢工；很多工人，连那些第二班的工人，也抱着胳膊干坐在机器前面。我来这个工厂很多年了，但我却从未见过这么棒的集会——人人畅所欲言，而且我们终于开始讨论起政治形势了。

11月16日（星期二）

波特鲁厂：组建了内部队伍，并且第一次有办公室文员（约有一百人）闯进所有的部门，搜查工贼。在发动机部，一些工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他们说：“现在白领来拖走工人了！”白领员工的积极参与是这次斗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昨天仍会离开工厂，上咖啡馆去，如今却与我们全厂的队伍共进退。这漫长而艰苦的工作，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开始结出果实。工人意识的提升开始显现；就连白领工人和技术

人员也开始理解到自己是被剥削的：他们开始反抗主管和上司；他们拒绝加班。简而言之，他们开始了解阶级斗争并向工人的先锋份子学习。今天，就在他们兴奋地揪出各部门的工贼的时候，一名技术人员跟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只是来这里看看机器；但今天我明白了这里也有人。从今以后，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在阿雷塞厂，今早六点，我们自治大会在米兰一个有很多阿尔法工人住的区分发传单，宣传拒交租金的行动，接着，我们从九点半罢工到十点半。即便一小时很短，我们也没放弃机会在厂内游行：我们一块儿行进，揪出所有的工贼。在电脑中心，每个人都在上班：我们强迫他们都出去，并开始讨论有关合同的建议、如何进行斗争、老板们如何在厂外挥霍我们的工资、以及我们一定要如何回应，譬如罢交租金、社区行动等等，而不是像个傻瓜一样整晚干坐在电视机前，因为这就会正中老板下怀。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工人想要就斗争进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批评，这才只是一小时罢工的成果呢。

1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发现管理层昨晚开了个会。他们都气坏了，因为他们无法在厂里不受打扰地安心上班。嗯，我们也开了个

会，决定在波特鲁厂设置罢工纠察直到十点，而这次“消防员”也阻止不了我们。结果罢工纠察线十分强硬。那些通常在入口处流连的工贼挺惨的——他们只能干站在那儿，没胆量走上前来，甚至不敢说话。他们三五成群，像教会门口的偏执狂似的；他们小声耳语、摇头、悲叹，等等。但他们没有行动，等着别人为他们越过纠察线。如同往常搞罢工纠察的时候一样，同志们借此机会讨论起政治问题，为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答疑解惑，鼓励他们。这些讨论往往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果，但长远而言却会留下痕迹。在日后的斗争中，你会在你身旁发现你从未想过会出现的人。

在阿雷塞厂，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都在罢工。那里没有设置罢工纠察线，但拉起了一支三千人以上的庞大队伍，巡逻并清理整个工厂。游行队伍前方举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三个五金工人工会的名称（FIOM、FIM 和 UILM），下面则写着“工人代表会”。领头的还包括了我们的阿姆斯特朗，他是一位会吹小号、演奏国际歌之类的无产阶级名曲的同志。突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几位同志成功发动了几台进入生产终段的车辆，把所有的喇叭一起按响！对于工会人士来说，在厂内的这种“长途步行”最重要的是“井然有序且负起责任”，但同志们并没

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是驱除工贼，他们会时不时地离开队伍，组成单独的小队，闯进各个部门。

11月19日（星期五）

在波特鲁厂，白领工人从下午三点开始罢工。他们见面后决定要在全厂范围内搜查工贼，因为“老是去同样几个办公室是不对的。”好几个办公室已经没人了，因为经理和老板的线人都不在。但工贼还是不少。那些从四点开始罢工的人加入了队伍。为了要突袭工贼，我们悄悄地爬楼梯，然后猛地把门打开，一起高喊、吹哨子。我们最常喊、喊得最带劲的是“秃鹫！”（即贪心鬼）。有几个办公室，员工呆在暗处，希望我们发现不了，但我们只要吹一声口哨，已经足以驱散他们，像曝露在灯光下的蟑螂似的。他们在正门前三五成群，在两个站着的警官之间。我们全体唱着《皮奈利的歌谣》（皮奈利是无政府主义者，1969年被政府杀害的）和《卡拉布西的杀手》（被指谋杀了卡拉布西的警察局长）。

12月5日（星期五）

昨天，警察攻击了米兰的罢工纠察线，而在阿雷塞这里，回应得很慢很不够。今天工人们从报纸上得知，在波

特鲁厂有人被警察在一场攻击中拿步枪揍到了脸，他们怒气冲冲地进了工厂，看见工会的大标语写着“罢工两小时，进军，包围食堂”。事到如今，工会的表现很清楚，它更愿意在厂内列队搞“纯粹的散步”，而不是“搜捕工贼”，这些小伎俩啊！警察在发动攻击，我们却像傻瓜一样绕着食堂散步！九点钟，当两小时的罢工开始时，两名自治大会的同志走出了游行队伍，一百多名工人当即效法，开始去搜捕工贼，甚至把厂内最小的、最偏僻的部门都走遍了。下午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在我们的一个部门中发现了五名在逃避罢工的工人。《帕斯奎诺报》特刊准备好了要指认那五名工贼，并宣布“帕斯奎诺会再次罢工！”（这是一份小报，张贴在工厂各处的墙上，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各部门、厕所、食堂等等——每每让你意想不到。没人知道是谁编写的这份小报，但人人都怕它。在这场斗争中，它成了类似侠盗佐罗的记号。）它通报了那五个工贼的名字，带来了令人难忘的效果：他们被整整嘘了两小时，可也没胆量离开，只能含羞忍辱。

12月9日至1月9日

我们回顾自己在12月9日到1月9日的笔记，斗争如常但没什么特别的事。唯一可讲的是，这个月尽是假日，

厂里的缺勤率非常高。

1月10日（星期一）

我们终于有突破了，像是从沉睡中醒来。今天早上波特鲁厂的厂内队伍敢作敢为，斗志旺盛。带着这股新生的斗志，游行队伍蜂拥到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把几里路的交通堵塞了。在厂内，第二班的工人拉起了队伍，防止下午五点后有人加班，并且阻止车辆从工厂的三号门进入。

在阿雷塞厂，早上八点半举行了一场工人大会。工会（FIOM）干部发言，建议照常的两个半小时罢工。全厂工人发出嘘声，喝倒彩。他被迫下台。然后一个自治大会的同志拿起麦克风，呼吁工人一起占领工厂，他极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家热烈鼓掌，FIOM的干部试图夺回对大会的控制权，但徒劳无功。一位与自治大会合作无间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同志拿起麦克风，建议封锁运输制成品的公路直到下午三点。大会一致同意，然而当工人们鱼贯而出，打算付诸行动时，FIOM的干部终于抢到麦克风。在一片混乱中，他开始致辞，大意是说，我们一定要遵守某些限制（什么限制？），别让少数人控制斗争等等。但此时大半的工人已经离开了，当只剩四分之一的工人时，“消防员”（那些压制工人阶级

自发行动的人)重提有限度的罢工和厂内行动。他要求举手表决,大概有三十人投“赞成”。他当即宣布提议获得通过,并以“工人大会至高无上!”这句老话结束了会议。

与此同时,第二班的工人封锁了公路,证明他们完全不在乎工会的指令。现场有约三千名工人,被堵截的车龙长达数英里。FIOM的干部在厂内奔走宣告:明天我们会封锁运送制成品的厂门。(那就像是在说:“老板,听着吧!明天我们要偷你的牛了。”那他就有时间把它们藏起来。事实上,车会在晚上被运出工厂。)他也说晚班也应该罢工,而同一时间,管理层正在各部门找愿意上晚班的人,还强调加班费来吸引工人。这个社会有许多工人失业下岗,但不论是在大小工厂,工人又被迫加班、上晚班、忍受加速制度。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利润,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我们别像工会一样哭哭啼啼,我们要再接再厉打败它。

1月12日(星期三)

当阿雷塞厂封锁全厂出入口的行动继续阻止了车辆制成成品出厂时,在波特鲁厂的食堂里,早上九点召开了大会。工人的参与程度很高,甚至可以说是全员参与。现场有两千五百到三千名工人,斗志也很高昂。FIOM的干部一拿起

麦克风，便嘘声四起，表明了工人有两个要求：厂内行动及封锁公路交通。工会干部试图拖延时间，建议作简单的罢工直到早上十一点，但嘘声更大了。他试图解释说，堵塞交通等于落入挑衅的圈套，但他们不让他再讲下去了。接下来他建议罢工到十二点，但集会者大叫“那不够长”。此时，另一个FIOM干部拿起麦克风说，执行委员会昨天对采取哪种罢工行动做了决定：罢工到十二点，且没有厂外行动，不过要是大会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厂外搞个短时间的游行。

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在把全厂清查完毕后，列队走出厂门，走上斯卡兰普大道（Viale Scarampo），这是米兰最荒废无人的街道之一。队伍行进期间，士气已被“消防员”重挫。队伍经过服务病危者的医院时，那里也有一支送葬的队伍。那时工人游行的步伐已经慢得像是送葬队的一份子。当队伍穿过一条小巷时，原先领队的工人代表会的横幅最终掉到了后面。我们抵达特维诺街（Via Trevino），警察早以剪刀形布阵列队等着。工人开始高喊“法西斯！走狗！老板的奴仆！”，在勇往直前的队伍的威迫下，剪刀阵开始分开两列。工人持续高喊，警察被迫后退，而工会会员反而组成警戒线以保护警察不被工人攻击！斗志较强的工人和工会“消防员”互殴了几拳，因为后者

指责前者想要搞对抗，故意挑衅。（说得仿佛这些警察每天驻守在厂门口倒不是挑衅了。）不论如何，警察退回到车上，我们的队伍则返回工厂。逼迫警察后退是一项主要的胜利。工会的真面目表露无遗：没用的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队伍在工厂后面；他们不敢与警察对峙，好像工人是向前锋发起攻击的神风敢死队似的；把主管当作唯一有权做决定的人，没完没了地请求；小心翼翼地从事阶级斗争。这些都是工会老一套手法的各种表现。它激发斗争的程度仅以维护自己的信誉为限，一旦来自底层的压力可能削弱它对局势的控制，它就总是准备泼冷水。

1月14日（星期五）

傍晚时，我们收到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法兰克·阿斯尼（Frank Atzeni）的消息——他被无限期停职了，针对他的指控照例由一个名叫卡拉布里托（Calabritto）的人事部的人提出。法兰克是自治大会中其中一个比较积极和投入的同志，过去几天，他奋勇参与关于晚班问题的斗争。当他被解雇的消息传出去后，他的同事自发地放下手上的工具。晚间时候，在基督教民主五金工会（FIM）的办公室举行了一场会议，一个新的斗争方向形成了：占领工厂。

1月15日（星期六）

尽管周六我们不用上班，但在阿雷塞厂和波特鲁厂，还是从早上六点设下罢工纠察线，以防止有人加班。在阿雷塞厂，早上六点纠察队员换班，让那些通宵坚守不让车辆制成品离厂的队员去休息。早晨晚些时间，自治大会开会研究形势，我们决定支持占领的建议，几个理由如下：

（1）上周的斗争越来越激进和尖锐。即便工会极力“灭火”，有好几件事仍然表明了工人的斗争意愿：与警察的冲突；由工人自己就晚班问题发起和领导的自发罢工；针对分化工人的企图的当机立断的回应。经过两个半月的斗争，工人阶级已经站起来了；

（2）工会意识到它无法再实行不痛不痒或虚弱无力的罢工了，到了这个节骨眼，我们一定要斗牛抓牛角、不畏艰险。这一点很明显了，譬如说，经常和法兰克起冲突的工会（FIOM）干部如今也公开认同占领；

（3）斗争已经发生了转变，如今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从纯粹的诉求（合同）变成更政治化的斗争（母公司 IRI 的压迫，以及再次企图推动那些部分国有的企业跟当权的右翼势力结盟）。

占领工厂会成为其他斗争的标杆。自 1947 年以来，除了因为破产而倒闭的工厂之外，还没有发生过占领任何大

工厂的事件。工会知道，面对着被拖延的劳资谈判和法兰克·阿斯尼的停职，工人阶级的行动会更有力量、更自主。它于是决心要控制局势，以避免被唾弃的尴尬。事实上，在下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提议占领时，FIOM 的干部当即表态支持，并主张采取一系列行动，譬如与民主党及其他政团公开对话、与地方政府会面、与其他工人代表会及工厂对话等等。然而，所有建议留待明天，等到执行小组全员到齐再作决定。

1 月 16 日（星期日）

代表团从罗马回来，在那里，政府、工会和资方之间的谈判停滞不前。它解释说，在一个“公开”的行政会议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谈判，只有“一系列的会议”，而这些会议看来什么也没有解决。资方坚持说，自动升级的建议会损害较高级的工人，他们只会同意从第一档到第二档的工人可自动升级，以消除最露骨的歧视事件。资方在这点上决不让步。所以在罗马没发生什么值得说的事情，但代表团坚持谈判并未破裂，只是“推迟”了。这有什么区别呢请问，谈判至今“推迟”了两个月啦？

关于明天要在工厂说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依旧存在着。当 FIOM 的当地干部开始概述昨天执委会会议提出的

共识（占领工厂）的时候，职位较高的 FIOM 的地区代表就说：“占厂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不能当儿戏。我们不能只是一时兴起，轻举妄动。我们一定要有纪律。”（看来任何纪律都是要工人阶级来守的。）“如果我们占厂了，许多不支持自动升级的工人就会回家去。我们要注意不要随性而为。我们无权决定。”（假民主呗，因为每当基层会员在工人代表会里推动什么的时候，人家就会跟他们说，最终决定权在执委会手里。）“我们得一步一步走。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延长几小时的罢工，然后我们会召开工人代表会，接着与其他政党开会、打电报给……”这从头到尾都是典型的“灭火行动”。甚至有一名 FIOM 的干部假装不知道“占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照他的说法，我们应该留在工厂工作，向老板证明我们没有他们也能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而曾支持占领的 FIOM 当地干部也马上倒戈。对工会来说，问题显然不是打开一个通向斗争的激进出口，相反，是遏制它，好让它不会爆发，搞出乱子。结果执行委员会的主流意见变成了在明天早上举行工人大会，可能作一整天的罢工；然后在星期二召开工人代表会会议，再跟其他工厂开会商讨示威的可能，接下来可能大张旗鼓地快速去一趟罗马，在市长办公室门口示威，等等，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堆“政治旅游”。事到如今，我们只能等

着看明天工人会怎么想。

1月19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9点到11点罢工，同时在波特鲁厂为办公室员工举行了几场厂内集会。其中一场我在场的集会中，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发言，强调了两个我们都觉得至关重要的主题：法兰克·阿斯尼的停职，以及占领工厂。阿斯尼必须复职，那位同志说，因为他一直在斗争的前线。公司打击他其实是打击我们在前线的所有人。（法兰克产线上的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浮现脑海：“法兰克对我们来说比一份好合同更重要，这不只是出于友谊。我们知道有他在厂里，我们就赢了；没有他，即便拿到了最好的合同也是一场失败，因为我们会变得更容易受伤害：只要我们一抬起头，就会被主管们打击。”）那位同志接下来提到以占领作为“团结大家的政治时机”的想法。占领会让我们觉得更团结以及是斗争的一份子。它能让我们讨论平常的政治问题，认识其他厂区的积极分子，听到他们的斗争的第一手经验。这场和文职员工的集会极富教育意义。它表明，有很多被蒙在鼓里、从未讨论过政治的人，只要开始形成了清楚的想法，就会和你并肩斗争。

1月31日（星期一）

各工会都在有系统地淡化占领的想法，声称我们顶多“象征式”地搞一天行动。与此同时，法兰克·阿斯尼复职了，这无疑是资方的一个重大让步，工人把这当作一场大胜仗来庆祝。今天早上，自治大会在波特鲁和阿雷塞厂发传单，努力阐明占领建议的性质和重要性，庆贺法兰克·阿斯尼得以复工。

在阿雷塞厂，工人们听说只有一小时罢工以召开工人大会后，都气坏了。大会在早上9点开始，参加者可谓人山人海。当FIOM干部开始讲话时，你能感到工人当中的那种紧张情绪——集会感觉像是一个准备爆炸的炸弹。干部解释着罗马谈判里鸡毛蒜皮的细节，显然他让这个一个小时就此流走，不给工人机会发言。但是半小时后，台下不耐烦的咕哝声不绝于耳，变得越来越大声，后来有人喊了出来：大会应该延长到11点。干部同意了，但从他的声音听起来只是随口敷衍。

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跳上台，从工会干部的手里夺过麦克风。另一位FIOM的干部插手，力图泼冷水来灭火，但几个自治大会的同志紧接着发言，让大会通过了占领计划。明天工人代表会将再次讨论，但事到如今，占领看似已经铁板钉钉了。

在波特鲁厂的工人大会也炸开了锅。早上 9 点，我一进食堂，就看见人们正在桌旁拿着餐具争论不休，又是大叫又是嘲笑。许多人已从早报上得知，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当工会干部开始讲起罗马谈判，大会马上就炸开了锅，人人都吼着“占领！占领！”，干部也开始沉不住气了，但仍然力图重新控制场面，提议进行地区性罢工，甚至是全国五金工人罢工，一起坐火车去罗马，但嘘声依旧。终于他同意搞占领，但“只是一天”。工人们马上回答：“两天！两天！三天！三天……”他意识到事情已脱出了他的控制，而且他还丢尽了脸。他就说，每个部门都要开会，进一步商讨占领事宜，要在明天的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通报讨论结果。10 点 15 分，大约两百名文员召开大会，其中有不少是当惯了工贼的。一位 FIOM 的干部检讨罗马谈判的结果。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趁机再次阐明占领策略的重要性：更激进的斗争和一个彻底开放的工厂。1 点 30 分，人们在食堂前聚集，讨论着各部门会议的情况。同志们都雀跃不已，在所有的集会上，包括办公室人员的会议，都通过了占领方案，更有不少是一致通过的。看来这个想法已经火起来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占领，仿佛已是既成事实。组织上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譬如得时刻提防法西斯的报复，厂内外行动的协调，等等。一切看来几乎是太宏大、太美

好，以至不太真实，但如果明天工会再试图撤回占领方案，它们将会彻底失去工人的信任。

2月2日（星期三）

在波特鲁厂，早上7点到10点设立了罢工纠察线。在阿雷塞厂，则是从2点30分罢工到4点30分。人们都在讨论着占领，好像今天就开始行动了似的。

FIOM 坚持不能从今天开始占领，因为这样会给资方停产的借口。事实上，他们是想留在“工会对老板”的游戏规则里；他们只相信高层的谈判，并且不想在工厂已被占领的情况下坐上明天在罗马的谈判桌。11点30分，许多部门和办公室的工人想要立即占领的消息传开来了！在许多办公室，经理四处奔走，叫员工明天放年假或特别假。他们还宣布，工厂的所有服务都会暂停。委员会终于达成共识，预定在明天早上9点开始占领，而且会维持整整二十四小时。

在阿雷塞厂，FIOM 的干部向大会澄清我们将不会“占领”（天理不容啊！），而是一个“长期的大会”。占领与否，在制成品厂房前的罢工纠察线依旧坚定，对老板而言那是最脆弱的地方。工人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傍晚时分，公司告诉一直表现得好好有“责任感”的工会掌权者，明天会是

正常工作日，人人都有工资拿。工会的游戏一直接着规则走：“如果我想的话，我能要你的命，但是我只会轻轻地弄你一下。老板，你也得给我点什么来报答我。”这就是工会，倒成了斗争最后的赢家！他们可真擅长平衡油门、刹车的技术，他们总是能找到“特许停车”的位子。由厂内先锋份子提出的占领，工会先是冷处理，接着反对，最后因为工人大众想干，只好赞成，但只是为了给它下绊子。

2月3日至4日（星期四、五）

波特鲁厂：早上9点工人大会，每个人都到场，连此前从未参与罢工的也来了。这是斗争至今的最高点。参与大会的包括了政客、工会干部、和好几个政治团体。连CP也来了，他们一如既往表示团结，留下一百六十元的支票（真恶心！）就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一个代表也到了，说了几句话，连坐也没坐就走了，像是开幕剪彩走过场一样。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话，大会就会变成一个大家都能上的舞台，从修正主义者到老板，个个都能在工人面前做场秀。

在大门口，有“守卫工厂”的工人。事实上，所有大门都关闭了；除了五号门，工人用大铁桶把门堵住了，还有一号门也开着，因为工会说要让执行委员们可以自由进

出。激进分子可以决定谁能进出。CP 和 FIOM 工会的官僚企图只让他们认可的人和团体进来，不过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至于学生，CP 极力限制他们的参与，只让米兰国立大学的三名学生运动代表进入。然而，我们迫使他们准许每间工厂的三名代表参与。早上一晃眼就过了，而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来说两句话又走了的大佬。我们建议将大会分成一个个小组，这样我们能更仔细地研究特定的议题，并且着手大约每一百人搞个小组，订立自己的议程。几分钟后，几个官僚来了，焦急地宣布，所有的执行委员都离开工厂了（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阿尔法停止了所有的服务（食堂、保安，等等），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学生马上离开。

真正让他们心烦的是，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工人大会参加小组讨论去了。这是真正的群众参与，从工人到文员；而且现在是真正的占领了，所有的干部都跳船而去，工厂真正掌握在工人手中——他们警觉地把守着大门，以防法西斯的攻击。和官僚们的预期相反，大家都留在厂内，选择参与小组讨论，意识到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在展现工人阶级的能力。在吃个三明治、小休之后，下午重新召开工人大会和小组讨论。在食堂的一楼，成立了近百人的学习小组。处理了几个议题，从文员的特别问题、厂内外的压

迫，到 CP 的路线，乃至政府右倾的当前形势。CP 和几个工会极力淡化占领斗争的政治意义，只让他们批准的人进来，这算是给他们上了一堂课。

晚上 7 点左右，工会想把工厂关上，不再对外开放，但最后决定 10 点之前准许其他工厂的工人进来。很多人晚上都回家了，留下来的几百人则在排班分配通宵守卫的任务。所有的大门都继续有罢工纠察线，厂内的各部门也一直在巡逻，厂外则有几队激进分子开着车检查所有可疑的人士。有一次，截停了两个开车的男人，查他们的证件。他们看起来真的挺可疑的，结果是两个在附近逛荡到凌晨 5 点的警察。

阿雷塞厂：占领工厂的一天。保安措施交给一名 FIOM 的干部掌管，他故意不给我们自治大会的同志红袖章——那是识别维持秩序的人的袖章。不管有没有袖章，我们都参加了罢工纠察。现场气氛很愉快，因为工厂在工人手中，巡逻各部门时还唱着斗争歌曲。整个早上都有不同政党、地方政府、其他工厂和学生团体的代表进厂里来。食堂没开，到了下午 2 点，我们都饿坏了。很多人回家或者到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打算下午再回来。“红色救援队”的激进分子带了些酒来，几家附近的社区合作社又在大约 2 点 30 分免费送了三千多份三明治来慰问。

当天最振奋人心的是一个激进剧团达里奥·佛公社的表演。善于模仿的维达尔表演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化状态，还做了一个关于现今社会消亡的模仿剧。表演引起了工人們的共鸣，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如果要检讨今天占领的情况，我们会说它并不如我们的期望，但与此同时，的确发生了很多正面的事情。首先这个胜利是基层工人从工会手里夺来的，甚至连管理的方式也是（基层工人说了算）——工会把它变成给政党和“大佬”的舞台的企图没能得逞。我们成功地把很多人带进工厂，包括其他工厂的工人、许多在校学生、出于工会的权力而与之打交道的各种政治团体中的激进分子。

2月12至13日（星期六、日）

星期四晚上，几名工人捣毁了厂区内的火车轨道，以阻止运载了二百五十辆车辆制成品的火车离开。工会在周六发声明表示，工厂的“外部”势力应对这“典型的法西斯”行动负责。这是工会攻击工人的手法。工人坚持必须不计代价地继续纠察，以防制成品被运走，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击中资方软肋的斗争形式（国内外的零售商都在施压，要求供应车辆）。几天前，一队两百人的警察设法把八部卡车（装有约六十辆新车）安全送出厂门，而工会一声也没

吭。今天傍晚（星期六），当我们自治大会在开会时，几个同志从阿雷塞厂来了。他们说，增援的警察正在赶去守护制成品的罢工纠察线，因为铁轨已经修好，他们想护送火车通过纠察线。我们马上动身赶去阿雷塞厂，抵达时发现大约有上千警察。我们不肯定他们是想用火车呢还是用卡车来运送。

约摸凌晨 1 点的时候，三十辆卡车出现在厂门外。（晚上 7 点时，大约有十二辆通过其他厂门进去了，警察还亲自动手帮着上货！）我们开始和卡车司机聊天。“我们的斗争，”我们说，“也是你们的斗争。你们也像我们一样被剥削。如果你们进去的话，我们夜以继日维持对制成品的罢工纠察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他们被说服了，拒绝进厂门。一队在里面驻守的警察走到门口，试图赶走坐在门口附近的同志。他们大吼着命令卡车司机过来，但司机没动。司机的公然违抗，搞得警察快要气炸了。十分钟后，他们撤回厂里，关上身后的大门。

此时，其他同事得知这个紧急情况后就赶来了（连一个 CP 国会议员也现身了，但是东张西望了几分钟后，就走了）。一位住在奥加罗区（Quarto Oggiaro）的同志用家里的电话通知大家，巧得出奇的是，警察封锁了所有从奥加罗区出来的道路。他的电话肯定被窃听了。但我们主要担

心的还是火车：现在路轨都修好了，要堵截火车肯定不容易。大概是凌晨3点30分，警察摆好阵式，打开大门后，他们用十辆卡车拉走了大约七十五辆车。工人冲着这些卡车司机喊：“法西斯！法西斯！”警察挥舞着步枪，以此逼退这些涌上前来的工人。有几个警察看起来喝醉了，趑趄趑趄，怒气冲冲，满脸仇恨。我们的人太少，抵挡不住他们，但是我们找到办法唬弄他们。我们有一大群人制造事端，搞得一片混乱，让警察忙活个不停，同时有一小队人悄没声地偷偷溜到卡车离厂的必经之地。他们向经过的卡车扔石头，成功地把后五辆卡车里几乎所有的小汽车都砸坏了。警察非常尴尬，而留在闸门外的卡车司机现在意识到今晚是没可能把汽车完好无损地运走了。护送卡车司机离开厂门的警察此时则在出口处与一群同志发生冲突。他们待其中一辆卡车稍稍移动，就开始攻击工人。我们回去警告司机，如果他们不撤退的话，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责任就在他们身上了。大约五分钟后，他们离开了，不久后，警察也走了。纵然面对着比我们多得多的警察，我们也有办法获胜，（1）因为我们成功游说卡车司机倒戈支持，以及（2）因为警察没想到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这么多同志来阿雷塞厂。

2月18日（星期五）

波特鲁厂：今天早上，工人代表会召开会议，FIOM的干部在会上解释本周在罗马最后达成的协议条文。“自动升级”是写在里面了，但几乎是一纸空文。协议里加入了许多升级的限制：譬如实际上有四档以上，因为在第一档有很多人永远无法升上二档，而二档到三档之间又有对工人差别对待的条款，更不要说在第四档，保留了一个达到另一档的产量。

对于文员，没有争取到什么他们想要的。工会谈到“尚待争取的事项”时提到，第二档升到第三档，可能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帮忙。把这段话翻成我们都明白的意思就是：先把这个问题搁着，等大规模动员已成过去，公司就有机会随心所欲，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什么时候搞就什么时候搞了。唯一的新事是：每人都有七十二元奖金，包括那些工贼。意大利共产党以一副凯旋的调子庆祝这份合约，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马上有人指出合约里的自动升级只是弄虚作假，实际上有多于四档，而文员们一无所获。现场气氛都不太满意，但工会说我们没法继续斗争，工人阶级都累了，所以我们应该先接受这份协议。即便我们自治大会也清楚，经过了一百五十小时的罢工，斗争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不怕承认这份协议有点令人失望，

尤其是对文员来说，离胜利还远着呢。

伍 壹 译

妇女与社会翻转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Donne e sovversione sociale

Mariarosa Dalla Costa

发表于小册子《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1972年。

以下评论尝试对“妇女问题”进行定义和分析，并将该问题置于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创造的全体“女性角色”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角色的中心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每一位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亦是如此。换言之，家务劳动不仅按照劳动时间和劳动性质来衡量，还以其生成的生活和关系性质来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家务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妇女的地位，与身在何方、属于哪一阶级无关。在本文中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的妇女才受剥削。相反，本文旨在证实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所有妇女的处境具有决定性，而前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切将妇女看做是一种社会“种姓”（caste）^[1]的分析都必须从对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处境的分析出发。为了以家庭主妇为中心进行讨论，首先需要进行简要地分析，包括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摧毁各种已有的家

庭和共同体类型以形成现代家庭的，以及家庭主妇在现代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摧毁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西方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展开讨论，但我们希望澄清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控制着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对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的摧毁必然发生或已经开始。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拥有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的家庭形式，是家庭在资本主义下所能呈现的最终形式。但若要对各种新趋势进行分析，就必须先对资本主义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家庭形式，以及妇女今天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将其看作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进行分析。我们还打算通过对在家庭之外工作妇女的处境进行分析，完善对女性角色的探讨，但是鉴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另文再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展示两种独立体验之间的联系，即作为家庭主妇的体验和作为工作妇女的体验。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日常斗争，直接与工厂组织和家庭组织进行对抗。自那以后，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可靠性”迅速增加，并直接与工厂通过时间和空间展开的管制进行对抗，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组织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2]进行对抗。青年男女工人更易旷工，更不遵守时间安排，工作流动性

更高。但是，在青年时期的关键时候，男性往往是新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整体上女性则不用受此束缚，但却必须一直考虑家务劳动，因此女性注定更不遵守工作纪律，破坏生产流程，提高资本成本。（这也是实行歧视性工资的一个借口，歧视性工资一般数倍于资本损失的补偿数额。）无法遵守工作纪律也是家庭主妇们在将孩子留给工作丈夫照看时的说法。^[3]这一趋势正是也将越来越成为工厂和社会工厂体系中危机的决定性形式之一。

* * *

近几年妇女运动频发，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运动拥有不同的指向和范围，其中有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冲突是男女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则认为妇女的处境是阶级剥削的具体表现。乍一来看，前者的立场和态度较为复杂，对于那些之前参与过激进政治斗争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以性剥削作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妇女，是显示我们自身挫败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妇女运动内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都有过这种挫败感。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她们的女同性恋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别涉及美国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同女人在一

起，所以我们承认不再忍受同男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妇女放在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被转移了，我们的力量被分散了，我们的目标被限定了。意识到这些，我们与妇女的联合会开始。”基于这种对异性关系的拒绝发展出的一场女同性恋运动，认为有可能构建一种没有性权力斗争、没有生物社会单元的关系，同时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和性可能性。现在，为了理解妇女以越来越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我们必须明确是资本主义家庭的本质导致了这种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但是对妇女的压迫毕竟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存在。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妇女作为女性的剥削，却也带来了最终解放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父权社会中，家和家庭对于农业生产 and 手工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化生产逐渐以工厂为组织中心。那些在工厂这一新生产中心里工作的人们可以得到工资，进不了工厂工作则领不到工资。由于家庭得依赖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劳

动，所以他们失去了家庭所赋予的相关权力，而这却被认为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必要的。资本摧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共同体和生产，一方面这将基本社会生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里，另一方面则从本质上让男人脱离了家庭，将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男人必须肩负起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简言之是肩负起为所有没有工资的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从那时起，那些无法生育、无法为工资赚取者提供服务的人开始被从家里驱逐出来。首先男人离开了家，然后是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家庭不仅失去了生产功能，也不再是教育中心。^[4]

男人基于严格的劳动分工担任着父权家庭专制领袖的角色，以至于妇女、儿童和男人的体验从获得时起便具有了矛盾性。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农奴共同体里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封建领主的财富，要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农奴共同体都被迫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展开合作，其中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受限程度是一样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需要打破的。^[5]就此意义而言，不自由的个人和不自由的民主^[6]同样面临危机。在从农奴制到自由劳动力的发展过程中，男性无产阶级同女性无产阶级分离开来，两者再同

他们的孩子分离开来。不自由的男性家长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性和世代的体验变得矛盾重重，导致了更深刻的异化和更具颠覆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儿童同成人之间的分离对于理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离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完全理解就妇女运动而言斗争组织只能以克服分离为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分离是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性”为基础的，就算妇女运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拒绝与男性建立任何关系，也只能是努力克服这种分离。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通过对近几年新出现的学校进行分析，特别是那些伴随学生运动诞生而出现的学校，我们认为学校就是意识形态规训、塑造劳动力和老板的中心。那些可能再也无法出现，或至少再也无法达到如此深刻程度的，正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之前存在的：这便是孩子第一天上托儿所时经常遇到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丢在托儿所、父母抽身离去时，一股绝望之情油然而生。但就在这一刻，学校的故事便开始了。^[7]

以此来看，小学生并不只会跟着高年级的孩子鹦鹉学舌，要求“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他们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同高年级的学生联合起来。^[8]小学生们，工人的子弟们，往往已经意识到了学校正以某种方式令其同自己的父母和同侪进行对抗，因此他们便本能地开始抗拒学习，抗拒“接受教育”。被关在英国“智障学校”（educationally subnormal schools）里的黑人儿童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抗拒。^[9]跟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一样，欧洲工人阶级的孩子认为老师就是教给他们对抗父母方法的人，这种对抗不是为了孩子自己，而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受剥削阶级的子女在统治阶级组织和控制的机构中接受规训和教育的生产体系。^[10]

那些上了大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上不了大学的）洗脑洗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同自己的社群进行对话，这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始于托儿所的异化灌输是以家庭分裂为基础的。

然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了第一批出于本能反抗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将其送往学校，并用学校限制他们，是因为父母们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训练远离限制自己的流水线或厨房。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展现出了某种天资，全家的关注将立刻

聚焦，为其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全家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带领他们跳出工人阶级，并为此孤注一掷。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资本流动的方式，资本利用父母的强烈愿望，规训新劳动力。

在意大利，父母越来越没法将孩子送去上学。孩子对学校的抗拒甚至在还未组织起来时便愈演愈烈。

儿童们的抗拒随着学校教育的增加而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拒绝接受资本对其年龄的定义。儿童看到什么便想要什么；他们尚未理解一个人只有付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有钱付款，必须要有工资，因此也必须是成人。怪不得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电视告诉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但是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难向他们解释，变为成年人是一个专制的时间点。相反，年轻一代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南部，年仅六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对抗警犬了。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爱尔兰见到了同样的景象，儿童像成人一样积极地进行反抗。如今儿童（和妇女）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怪乎出现了更多儿童（和妇女）参与革命斗争的例子。新的情况是，尽管儿童被排除于直接生产之外，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参与有了“自主

性”^[21]。在工厂中，青少年们拒绝接受年长工人的领导，在城市里，他们成了反抗先锋。在大城市里，好几代核心家庭都产生了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始撼动既有权力的框架：在第三世界，先是失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然后才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6月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次校长会议，有位校长因为打学生而受到了警告：“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因素’潜伏在各个角落，似乎计划着侵蚀所有权威的力量。‘这’是一个阴谋，企图摧毁我们赖以构建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学校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坚固堡垒。”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12]领域里阻碍他们各种

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

迫使每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十九世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

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度、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13] 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14]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确实存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妇女囿于孤立的状态，封闭在家庭之内，完全依赖于男人。她不享有自由雇佣奴隶的新自主性，依然处于个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次却更为残酷，因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大规模高社会化生产。妇女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无法理解某些事务的观点源于历史，这段历史在某些方面与低能学校“落后”儿童的遭遇何其相似。只要妇女还与直

接的社会化生产隔绝开来，在家中被孤立起来，她就不享有邻里之外社会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也不享有接受社会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当妇女被剥夺了组织和策划集体工厂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的各种体验时，她们便不能接受基本教育，没有社会反抗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涉及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换言之，了解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所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因此，妇女遭到的孤立便向社会和她们自己证实了“女性是无能的”迷思。

这一迷思首先隐瞒的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共同体内组织群众斗争，发动集体抗租运动和针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因为以共同体内妇女不断的非正式性组织为基础；然后隐瞒的是，在直接生产周期的斗争中，妇女的支持和组织，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至关重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妇女网络正是通过那些“无能女性”的才能、精力和实力才得以成形并发展起来的。但是上述谬见依然存在。当妇女可以与男人一起宣布成功地渡过了失业难关，或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并取得了罢工胜利时，胜利的战利品才属于“整个”阶级。妇女就算不是没有，也很少为自己争取任何好处；很少以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家庭权利结构及其同工厂之间的关系为斗争目标。不管罢工还是失业，妇女的工作远未完结。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摧毁了作为人的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减少妇女的身体完整性。资本主义出现前，男女的“性”（sexuality）^[15]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各种形式的制约。虽然有过各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资本让家庭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呈现，在家里女人得服从男人，因为女人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也不会独立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妇女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工作的可能性被切断了，随之切断的还有其性、心理及情感自主性的表达。

我们认为：妇女身体完整性的缓慢发展，是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从大脑到子宫的一切。与他人一起参与火车或飞机的生产，完全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孤零零地在几平方英尺的厨房里拿着同样的扫帚打扫卫生。

这并不是在飞机制造领域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设想两种历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实际斗争形式的差异，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处于隐形中的一些事实：过去妇女斗争的不同形式。妇女被剥夺了各种开发创造性能力的可能性，她

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剥夺了性生活，性生活只是为了生育劳动力：我们关于家庭服务技术水平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生育控制（顺便提一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妇科领域），适用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的对象总是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不出所料，当大多数原始的节育方法不再奏效时，妇女只能生下孩子，无权堕胎。

这是一种对妇女的彻底贬谪，自此资本开始塑造女性角色，利用男性在家里贬谪女性。男人是雇佣工人，是家长，是“妇女剥削”这种“特定剥削”的特定工具。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便可解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导致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决定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退化，从此女性便从属于男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补充”。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中各种趋势爆发是合理的，女性欲以这种方式^[16]与男性进行斗争，甚至不再希望靠自己维持性关系，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各种关系都是令人沮丧的。权力关系排除了出现任何好感和亲密关系的可能。但在男女之间，权力的权利便是控制与性相关的好感

和亲密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同性恋运动是最大规模的尝试将性从权力中解脱出来的运动。

但是一般而言，同性恋同时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框架之中：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待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全天彼此分离；一家拥有一千名女工的工厂需要十名工头；一个打字小组（当然全由女性组成）为五十名职业男性工作。上述情形均属同性生活框架。

资本将异性恋升级为了一种宗教，与此同时却在实践中让男女无法彼此接触，不论是在身体方面的还是在情感方面，资本除了在性、经济和社会规训方面支持异性恋，在其他方面均暗中破坏异性恋。我们认为我们应就上述事实展开讨论。同性恋趋势的爆发一直以来都对妇女运动至关重要，因为相关趋势让宣布妇女斗争的特殊性变得紧迫了起来，特别是深度阐明妇女剥削的各个方面和相互联系。

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现在，我们需要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在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进行一些澄清。即，当妇女不在

社会生产之内，不在社会生产周期之内时，她们也不在社会生产力之内。换言之，妇女往往被认为在心理上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少数女性离家工作外，大多数女性尚在生产之外；妇女本质上是一系列家庭使用价值的提供者。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的观点，是他在目睹了工厂女工的遭遇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妇女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至少在家里她们的生活方式更高尚。但是马克思从未意识到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但是很多观察者们却已经注意到了，在兰开夏郡，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妇女在担当棉花工人，她们在性方面更自由，也有男人帮忙干家务活。另一方面，在约克郡的煤矿区，妇女很少离家工作，丈夫更占支配地位。甚至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化生产中定义妇女剥削的人，也不能理解妇女在家的剥削地位；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里变得不够公正。基于上述原因，只有妇女才能定义自己，提出妇女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工资里，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至关重要。^[17] 这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人格的整个女性角色，女性在各个层面均处于从属地位，包括身体上、精神和职业上，在追求更高社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女性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位于一个明确且关键的位置上。让我们深入地探寻，妇女作

为社会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家庭开始分析。

A. 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

人们往往认为，根据雇佣劳动的定义，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不具备生产力的。事实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变成了私人活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家务劳动本质上并不属于“女性工作”；跟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洗涤和清洁时，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亦不会减轻疲惫程度。由于这些工作服务于繁衍后代，故属于社会服务。而资本则通过构建核心家庭结构，将男性从相关功能中“解放”出来，自此男性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直接进行剥削了；自此男性能够自由地“赚”钱，让女性为其繁衍下一代劳动力了。^[18] 资本成功地将男性变成了雇佣奴隶，然后又成功地将相关服务分配给了家里的妇女，借此控制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妇女对于家庭来说依然是必需的，资本依然需要这种家庭形式。大体上以欧洲目前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意大利，资本依然倾向于进口劳动力，从欠发达的地区进口数以百万计的

男性劳动力，与此同时把妇女困在家里。^[19]

妇女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计薪酬地从事家务劳动，不会罢工，还因为她们总是欢迎那些因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家人回家。家庭是母亲的摇篮，时刻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事实上这是失业者最好的保障，这样他们就不会一失业就变成一群具有破坏性的失败者了。

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组织的政党均小心翼翼避免触碰家务劳动的问题。他们一直把妇女视为较低的一种生命形式，除此之外，甚至是在工厂里，提出相关问题也会挑战工会的整个基础，工会这种组织只负责处理（a）与工厂相关的事务；（b）可计算和“付薪”的工作时间；（c）与工资中发放部分相关的事务，不涉及被收回的那部分，即通货膨胀。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强迫下，妇女往往不得不推迟解放的时间，推到未来的一个假设时间点，并完全依赖于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利益，但其实在上述政党的限制下，男性斗争的范围亦十分有限。

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都加剧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程度。发放家庭主妇津贴的建议^[20]（令我们不禁生疑为什么发放的不是工资）只说明了这些政党十分乐意进一步将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将男性（和女性）

制度化成为雇佣奴隶。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我们中没人相信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解放了。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工作依然是工作。雇佣劳动者的独立性仅仅意味着不论男女对于资本来说他/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人”。那些认为只要在家外找到工作就能让工人阶级妇女实现解放的观点，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沦为流水线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流水线本身的奴役性，并再次证明了如果不了解妇女是如何受剥削的，就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男性是如何受剥削的。这一问题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单独讨论。我们想在此澄清的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干活却没有工资，这意味着丈夫也是老板。丈夫成了家庭服务的唯一接受者，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了起来，并更倾向于奴役。丈夫和孩子通过爱的参与和爱的勒索成了第一批工头，成了家务劳动的直接控制者。

丈夫总是边看报纸边等着妻子准备好晚餐，甚至当妻子跟他一起外出上班时也是如此。显然，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特殊的剥削需要采取形式同样特殊的斗争，即在家里开展妇女斗争。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

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言之，我们将继续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有人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将受到阻碍、遭受失败，难以充分地展开行动。在此我们不就其展开讨论。然而，为了揭示并谴责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被掩盖的生产劳动，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斗争目标和形式的问题。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事实上，妇女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关要求，即“付我们做家务的工资”，鉴于意大利目前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令我们看起来好像打算进一步确定制度化奴役的风险，制度化了的奴役是伴随家务劳动而生的，因此在实践中支付家务工资的要求很难成为一种动员目标。^[21]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要让家庭主妇安静地待在家里，等着发放无法偿付其劳动的工资，

最少也得让她们做好准备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我们必须发掘各种斗争形式，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结构，彻底拒绝做家务，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让家变成贫民窟，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不做家务，而是要彻底粉碎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如何提高做家务的效率，而应该是在斗争中找到主角的位置，不是更高的家务劳动生产力，而是更高的斗争颠覆性。

要立即颠覆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无需每天都花时间熨烫床单和窗帘，无需不断地清洁地板直到反光为止，也无需每天拂去灰尘。但是还有很多妇女一直在做这些。显然不是因为她们傻：我们再次联想到上文中提到过的与低能学校的相似性。事实上，只有在家务劳动中他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将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隔离了出来。

但不能因此自动认为与社会化生产隔离等同于与社会化斗争隔离：然而，斗争需要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同时也赋予了妇女另一重身份，此前妇女只能在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获得其身份。在斗争的社会性中，妇女发现并行使权力，有效地获得了新身份。新身份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社会权力新的大小程度。

妇女进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来自于家务劳动的社会生

产性特征。尽管目前家庭服务实际上属于妇女的职责，但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家里的社会服务让妇女的角色更具有社会生产性。但是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尽管资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愿意这么做，但是至少在意大利，资本摧毁了家庭主妇作为核心家庭支点的地位。因此，我们期待家务劳动的自动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绝不会实现：核心家庭的延续与家庭服务的自动化是相容的。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资本则不得不摧毁我们所熟知的家庭模式；换言之，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就不得不进行社会化。

但是我们太了解他们口中社会化的含义了：至少是跟巴黎公社相反的！

资本主义的重组可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和更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飞跃，这都将通过构建一个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平等性的家庭模式，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关系，通过合作劳动摧毁其统治地位；通过让前资本主义式的不自由的妇女担当其支点，来超越家庭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让家庭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功能，即繁衍劳动力。

再回到上文中的讨论：妇女，家庭主妇，是认同家庭的，在做家务时也力臻完美。有句俗语耳熟能详：在家里

你总能找点事做。

但她们不会看到家外的世界。家庭主妇的处境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这样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被强加到她们身上，让她们觉得世界、他者和整个工作组织都是难以理解、本质上未知和不可知的；她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每天出门遇到这些事情，而她们感知这些的方式只能是，作为丈夫身后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提出妇女必须推翻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必须走出家门时，我们的意思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们必须是心甘情愿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这样才能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不仅是作为邻居和朋友，更是作为工作同伴和反对工作的同伴；因此，我们要面对各种困难，打破女性私有化的传统，然后让女性真正地团结起来：团结不是为了抵抗，团结是为了进攻，为了组织斗争。

对抗普遍的劳动形式，要普遍团结。同样地，妇女不能再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面对丈夫和孩子了，换言之，下班回家后用餐时不再当妻子和妈妈。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个领域均以家庭为前提，所以家外的每个斗争场所都为妇女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工厂会议、邻里见面、学生集会，都是妇女斗争的理想场所，都

是妇女得遇见并面对男人的场所，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妇女 vs 男人”，但他们代表的是个人，而非母亲 / 父亲、儿子 / 女儿，在家外，矛盾和挫败感很有可能一触即发，而这本来是资本打算令其在家中爆发的。

阶级斗争的新方向

如果妇女在工人集会上要求废除夜班，因为晚上除了睡觉还要做爱，而且如果白天工作白天做爱的话感觉会很不同，那么这就是在与工作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抗，推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权益，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她们不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妈妈了。

但是在新的干预和对抗中，妇女也表示，她们作为女性的权益并不像她们被告知的那样，与阶级利益相脱节、水火不容。长久以来，各种政治政党，特别是左翼和工会，都决定并限制了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域。做爱以及为了做爱而拒绝上夜班是符合阶级利益的。只要对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性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便可明白整个阶级历史。

如果在学生集会上见到自己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的同伴也是一个个的个体；对于他

们来说，你也是一个个体。很多妇女都流过产，也生过孩子。我们不明白在医学学生的集会上，不管是不是学生，为什么她们首先就不能作为女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以医学学生为例事出有因。不仅仅是当底层的病人被当作研究用的小白鼠时，在教室和诊所里，我们也总能看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尤其是，妇女总是实验的研究对象，也是性蔑视、性虐待以及医生自大的主要受害者。）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运动的爆发表达了女性权益的特殊性，相关利益迄今为止均与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切断了联系。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妇女运动，整个社会正是建立在对妇女权益的压榨之上的，整个阶级剥削都是建立在“妇女剥削”这种特定的“中介”（mediation）之上的。

所以在妇女运动中，我们必须确定存在剥削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发动斗争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妇女权益的所有特殊性。

每个机遇都不应错过：受驱逐威胁的家庭主妇们可以提出反对，她们家务劳动的应付工资超过了每个月应付的租金。在米兰郊区，很多家庭已经开始以这种形式发动斗争。

使用家用电器令人愉悦，但是对于制造工人来说，制

造大量的电器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用工资是很难买下各种电器的，料想妻子们也得独自使用这些电器；这只能意味着她们得待在家里，只不过现在家的机械化水平更高了而已。幸运的工人，幸运的家庭主妇！

问题是没有集体食堂。我们必须牢记的是，资本首先得让所有工人都开上菲亚特，然后才可能开食堂。

因此，如果社区光有开设集体食堂的想法，而不将其纳入对抗劳动组织和劳动时间的斗争实践的话，则存在出现新飞跃的风险，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和一些诱人的工作中，其对妇女的控制最为严格，因此很有可能食堂里的午饭非常糟糕。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食堂，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游戏中心和托儿所。^[22] 我们想要食堂，我们也想要托儿所、洗衣机和洗碗机，但是我们也想拥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跟几个朋友在私密的环境里用餐，可以选择花时间陪陪孩子、陪陪老人、照顾病人，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有时间”的意思是减少工作。有时间陪孩子、陪老人和照顾病人的意思不是到相应的托管机构里看一下就走。意思是我们这批首先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斗争里应起带头作用，这样其他那些也被排除在外的人，即孩子、老人和病人，才可重新获得社会财富；重新与我们联合起

来，我们也和男性联合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作为附庸而是自主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被排除在直接的社会生产之外，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而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拒绝工作

我们拒绝接受“家务劳动”成为妇女专属的工作，凌驾于我们之上。家务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也从未得到过补偿，他们却强迫我们每天干十二至十三个小时的家务，强迫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必须走出家门，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同其他妇女团结起来，一同与所有认为妇女必须待在家里的情境做斗争，不管身在何处，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我们将同所有的妇女一起斗争。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因为我们在家中提供的社会服务无法在其他场合提供，因此所有在外工作的人便提出要求，干脆放弃一直肩负至今的重担，扔回到本应承担这一重担的资本的肩上。斗争引发的改变越激烈，妇女们就会越发加抗拒家务劳动，妇女们也会更激烈、更决绝，斗争规模就

会更大。

工人阶级的家庭更难破裂，因为家庭支撑着工人，工人支撑着资本。家庭支撑着阶级，是阶级赖以维系的基础，尽管这是阶级牺牲妇女本身为代价的。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就像工会一样，家庭保护工人，但也确保了工人不论男女只能是工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妇女对家庭展开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看一看其他在家里或家外工作的妇女，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他的斗争机会。只要我们的斗争针对的是工作，这种斗争便蕴含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作展开的斗争之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家务劳动对妇女进行剥削的历史仍然具有特殊性，这与核心家庭的存续息息相关。妇女斗争的具体过程是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这为阶级斗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B. 被动性的生产力

然而，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隐形的、无工资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我们在开篇中所述，将妇女囚

禁在单一的补充性功能中，并在核心家庭中使其服从于男性，都是以妇女缓慢发展的身体完整性为前提的。在意大利，天主教认为女性低人一等，因此女性被迫在婚前实行禁欲，婚后也处于性欲被压抑的状态，性生活只是用来繁衍子嗣，强迫妇女生孩子。因此形成了“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身份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华，论其功能，女性本质上也只是他人情绪的接受者，家庭对抗的缓冲者。女性性冷淡必须重新定义为性功能中被迫的被动接受性。

如今，家庭主妇的被动性本身也具有“生产性”。首先，被动性把女性变成了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变成了男性渴望行使权力的对象，这种权力是在资本主义工作组织支配性的灌输下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女性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也具有生产性；她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其次，女性之所以具有生产性，是因为对其个人自主性的彻底否认，强迫她们将挫败高尚化成一系列以家庭为中心的需求。这是一种与家务劳动完美主义强迫症类似的消费。显然，不需要我们去告诉妇女她们的家里需要什么。没人能定义其他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组织斗争。通过斗争，“高尚化”变得不再必要。

死亡劳动和性的痛苦

我们建议使用“高尚化”这个词。单调琐碎家务导致的挫败感与性被动导致的挫败感实为一体。性创造力和劳动创造力这两个领域，都是出于人类需求，我们无需对“相互影响的先天和后天活动”加以界定的领域。^[23]对于妇女而言（也对于男性而言），先天和后天的权力同时受到抑制。女性被动的、被插入的性强行创造出了爱整洁的家庭主妇，反而令单一的组流水线工作显得轻松了。大多数家务和规训都是琐碎的，需要每天、每周、每年重复相同的工作，每逢假日还需加倍，这杜绝了不受约束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小时候我们即为受苦受难做好了准备：我们接受的教导是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同时牺牲性和其他创造性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透过摧毁阴道高潮的谬见，妇女运动令人瞩目地揭示了男性严格界定并限制女性性潜力的生理机制。如今我们可以开始将性同创造力的其他方面重新整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探寻性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直到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再残害我们，不再损害我们的个人能力，直到我们的性同伴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不再受其工作的残

害。要想驳倒阴道谬见，就要主张与卑躬屈膝和自我高尚化相对立的女性自主性。但是并不只有阴蒂与阴道之间是对立的。两者还与子宫对立。阴道要么是繁衍劳动力并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的道路（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要么是我们自然权力和“社会设施”（social equipment）的一部分。在所有的表达中，性毕竟是最具社会性的，是人类最深层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性就是自主性的消解。工人阶级以阶级的形式超越了作为阶级的自己；在阶级内部，我们自主地进行组织，奠定超越自主性的基础。

针对妇女的“政治”攻击

但是当我们在斗争中寻找成为自我和进行自我组织的方式时，甚至当我们发起运动时，我们发现需要面对的是那些极其渴望对妇女展开攻击的人。他们认为，在妇女通过工作和消费保护自己免遭消灭的过程中，她们应对阶级的不团结负责。以下是一份关于妇女指控的不完全清单。他们认为：

- 1、她想要丈夫花更多的工资为自己和孩子购买

新衣，这是建立在她认为自己和孩子应该穿什么的基础上的，而非丈夫认为她需要什么。他为了赚钱努力工作。而她却只要求分配他们本就不多的财富，而不是帮助丈夫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工资；

2、她与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展开竞争，她想拥有更多的东西，想让自己的家比邻居的家更干净整洁。她们本应该以阶级为基础进行联合的，但事实上却没有；

3、她整日待在家里，拒绝了解男人在生产线上的斗争。当男人参加罢工时，她们甚至怨声载道，而不是提供支持。她们支持保守派。

有些人认为妇女是反动落后的，上述便是他们的理由，甚至那些领导工厂斗争的男性、那些参与过激进行动、看起来本应最能理解社会雇主本质的人也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以自己的标准谴责妇女的落后，因为这正是整个社会盛行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会说他们从妇女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了多少好处，不会说打出生起便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照顾，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妈妈、姐妹和女儿的照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难将天生的男性至上同男性的攻击区分开

来，后者看起来非常具有“政治性”，只为阶级利益而进行攻击。

我们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1. 作为消费者的妇女

妇女没有把家变成消费中心。消费是劳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妇女拒绝购物（即消费），那便等同于罢工。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因为妇女不能从事社会组织的劳动，被剥夺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她们总是试图通过购物来进行补偿。关于妇女购物是否属于琐碎的消费，取决于判定者的观点和性别。知识分子买书，但没人认为买书是琐碎消费。书籍除了具有内容的有效性外，在当今社会还代表男性的价值，依靠的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古老的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为家添置物品是因为家是唯一能证明她们存在的东西。但是，那种认为节俭消费即解放的观点跟资本主义一样古老，提出这种观点的正是那些总将工人处境归咎于工人自己的资本家们。一直以来，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告诉哈莱姆（Harlem）^[24]的，

只要黑人男性不开凯迪拉克（直到财务公司将车收回），种族问题便可得到解决。直到斗争的暴力（这是唯一适合的回应）产生了一种社会权力，凯迪拉克只不过是少数几种向人们展示潜在权力的途径之一。是这个而非“实践经济学”给自由主义者们带来了痛苦。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自由的话，就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了。不需要买他们用以毒害我们的食物，不需要买那些通过阶级、性别和世代来辨识我们的衣服，也不需要买他们用以禁锢我们的房子。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得到的永远不够，而不是我们得到的太多了。女性对男性施加的压力是在捍卫工资，而非攻击。正因为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男性才将工资分成自己开销和一般家庭支出两部分。如果妇女不提出要求，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整个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先牺牲妇女的需求。^[25] 因此，除非妇女提出要求，家庭才能对资本发挥作用，在另一个意义上才能对所列对象发挥作用：可以应付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因此，妇女提出要求是保证阶级生活水平最为持续性的物质方式。到了参加政治集会的时候，她们需要的钱会更多！

2. 作为竞争对手的妇女

至于妇女之间的“竞争状态”，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已经就第三世界进行了澄清，只有种族主义才能避免（这种竞争状态）普适于阶级。他认为被殖民者如果不组织起来对抗压迫者的话，便会互相攻击。女性面对更多的消费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不时地以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如上所述这是为了保证阶级的生活水平。这种竞争不同于女性的求偶竞争；是根植于女性对男性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之上的。只要女性还得为男性而活、为男性而穿、为男性而工作，男性就可通过这种竞争对她们进行操纵。^[26]

至于在家中的敌对竞争，妇女自打出生起便接受训练，着迷于整洁的家，并想拥有它。但是男性无法鱼和熊掌兼得；他们不能一边享受拥有私人奴仆的特权，一边抱怨私有化（给他们）的（不利）影响。如果他们继续抱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对女性敌对竞争的抨击实际上是对女性奴役感到了抱歉。如果法农的说法不对，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不是组织水平低下的表现，那么对敌对便是他们先天无能的标志。当我们将家称之为贫民窟时，家即成了受到间接支配的殖民地。要解决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

抗，就要自发展开斗争。妇女已经克服了比竞争更大的障碍，团结一致，支持男性斗争。妇女们还不够成功的地方在于，尚未制造机会、提出要求，改变并深化斗争的契机。自发斗争彻底改变了整个问题：不再是“妇女将团结一致支持男性”，而是“男性将团结一致支持妇女”。

3. 引起分裂的妇女

之前是什么阻止了妇女参与政治？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妇女被利用来反对罢工？换言之，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从本文一开始，我们便开始关注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化生产之外的这一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在工厂里一起劳动，在家里孤立劳动。这也主观上反映在了工厂工人独立于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中。共同体要做什么？妇女要做什么？是支持吗？在家里和斗争中都作男性的附庸？甚至成立一个妇女的辅助工会？这一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充斥于整个阶级的历史中。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只要位于生产周期中心的人忽视了最外围的人，后者便会对前者展开斗争。这便是工会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当黑人工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时（从来不是白人工人被引

导而相信的那样)，跟妇女一样是，黑人会容易被立即辨别，关于破坏罢工的报道更加强了这一源于客观分裂的偏见：白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黑人只能在旁边打扫卫生；男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女人只能在家里打扫卫生。

当男人拒绝工作时，他会觉得自己富有战斗性，当女人拒绝工作时，同样一批男人却觉得她们挑三拣四。矛盾的是，当一些女性因为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而投票支持保守派时，男性会觉得她们十分落后；但同时那些男性投票支持的政党，从来不考虑女性的存在，认为她们只是起稳定作用，这些政党照样会出卖他们（以及我们所有人）。

C. 规训的生产力

如上文中所述，由于被贴上了人格发展缓慢的标签，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妇女都成了一个压抑性的形象，成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规训者。这是妇女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第三个方面。当一个女性的整个存在拒绝了这种理想角色时，她们的生活便陷入了丈夫和家庭的暴政之中，以及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暴政

之中。那些受到暴政欺压且缺乏权力的人，在下一代还小的时候便与之生活在一起，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顺从的工人和小暴君。这种方式跟学校老师别无二致。（在这件事上，丈夫是支持妻子的：家长与教师的结盟绝非偶然。）妇女负责繁衍劳动力，一方面负责规训将来成为工人的孩子，另一方面负责规训外出工作的丈夫，因为只有他的工资才能支付繁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

在此我们仅尝试讨论了女性的家庭生产力，并未就其心理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其中虽然遇到了有关妇女扮演角色的各种复杂情形（此外，换言之，家务劳动实际上就是她们在无薪情况下承担的重担），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并从本质出发对女性的家庭生产力进行了概括。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摧毁将妇女与彼此、与男性、与孩子分裂开来的角色，每个禁锢于家庭之中的妇女都如家蚕一般“作茧自缚”，死后将丝茧留给资本。正如上文中所述，拒绝所有这一切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意味着将自己看成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她们因为没有工资，是阶级的最底层。

家庭主妇在整个妇女斗争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们破坏了支撑家庭——这一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关键支柱。

所以只要是倾向于肯定妇女的个性、否定妇女只是起

补充作用的家庭主妇，相关目标都是值得提出的，都是对角色延续和生产力具有颠覆性的。

就同样的意义而言，所有有助于恢复妇女基本身体功能完整性的要求，都是最迫切的，其中性要求首当其冲，因为从一开始资本便剥夺了性和生产创造力。

难怪有关生育控制的研究进展缓慢，难怪几乎在世界各地堕胎都是被禁止的，除非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要想推进相关要求，不能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管控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歧视工人阶级，尤其是妇女。

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妇女、第三世界的妇女在研究中被当作实验对象呢？为什么生育控制依然属于妇女问题？若想展开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对相关问题的管控，就需要在阶级基础上行动，特别是女性基础。若想将这些斗争同将母亲看成是妇女专有责任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将家务劳动看成是妇女工作的斗争联系起来，最终抵抗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妇女解放模式——这些模式不过是拙劣地复制了男性角色——就需要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展开斗争。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孤立的家庭主妇身后隐藏着社会劳动，必须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有些人认为妇女因为孤立得依靠他人的工资，因此她们也为他人意识所影响，关于女性无法胜任相关工作的谬见便根植于此，迄今为止，只有一项行动曾经摧毁过这一谬见：妇女领到工资，个人经济不再依赖他人，独立的经历与家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办公室的社会化结构中，妇女均可参与社会劳动，并以自己的形式和阶级的传统形式展开社会反抗。妇女运动的诞生是拒绝采用这一替代方案的结果。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地位，这为发起运动提供了动力，资本本身也利用这一动力对劳动力进行了重组，增加了女性的数量。妇女运动只能在反对中开展。正因为出现了妇女运动，也正因为在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发声，运动才提出拒绝接受通过工作实现解放的谬见。

我们已经工作够了。用手或是借助机器，我们已经摘了几十亿吨的棉花，洗了几十亿个的盘子，擦了几十亿间房的地板，打了几十亿的字，调了几十亿次的收音机，洗

了几十亿片的尿布。每次他们“让我们加入”一些男性的传统领域，都是为了在新的水平上剥削我们。尽管明知两者不同，在此我们还是得再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同大都市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准确地说，将其与大都市的厨房进行比较。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规划是使其“发达”；第三世界除了要忍受目前的痛苦外，还要忍受工业反革命的痛苦。大都市的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援助”。我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她们有的是因为迫不得已，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有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对其他女性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深陷于血腥的打字室或流水线了，并且毫无获得拯救的可能。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并不是为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孤立处境，尽管家在周一早上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同样，家庭主妇斗争也不是为了刚脱离家庭的禁锢，又得困在办公桌旁或机器旁，尽管跟第十二层楼公寓里的孤独感相比，外出工作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

妇女必须充分发掘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担任远洋船的船长。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做这些事的希望，但是这些目前也只能写入资本的历史中。

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斗争的模式，尽管他们将

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却一方面避免双重奴役，另一方面避免另一程度的资本主义控制和管制。最终这将成为妇女运动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政治之间的分割线。

天才女性似乎并不存在。自从妇女与社会过程割裂开来后，天才女性便不可能再出现，我们也看不出妇女可在哪些事情上发挥她们的天赋。如今这样的事情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斗争。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经说过，每位女性从一出生起便患上了“阴茎嫉妒”。但他忘了补充说，当她已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阴茎意味着拥有权力，那一刻这种嫉妒感开始了。弗洛伊德更加没有意识到，当男女之间的分离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分工时，传统的阴茎权力便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而这便是我们可以开始斗争的地方。

马 新 译

吴碧莲 校

[注释]

[1] “种姓” (caste) 平常指与印度教有关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借用这个词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早这样用的大概是美国的罗克珊·邓巴 (Roxanne Dunbar)。在《女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1969) 中，她把“种姓”定义为“一个基于可辨别的物理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类别”——与“阶级”“阶层”等其他等级范畴所不同，“这些特征一出生便被赋予，靠自身的力量无法逃离”。

[2] “社会工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 (operaismo) 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托伦蒂 (Mario Tronti) 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但其基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工厂一样去管理。

[3] 这是 1970 年 8 月美国妇女庆祝国际妇女节时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一部分。——原注

[4] 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阐释“教育”的全新意义，义务教育——强迫学习——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英国，教师被认为是“道德警察”，他们可以 (a) 约束儿童不“犯罪”——避免工人阶级进行社会再占用；(b) 摧毁“暴民”，工人阶级以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家庭仍然是具有生产力的单元，或至少是可行的组织单位；(c) 让定时出勤和守时成为习惯，这对于儿童未来的就业来说是必要的；以及 (d) 通过分级

和选择对阶级进行分层。至于家庭本身，其向控制新形式的过渡不甚顺利、是非直接的，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各个阶段阶级内和资本内矛盾力量作用的结果。——原注

[5] 雇佣劳动的基础是所有关系服从于工资关系。工人必须以“个人”的身份签署合同，资本将剥夺亲属关系的保护。——原注

[6] 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原注（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45—404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注）

[7] 此处我们无意探讨核心家庭狭隘性的问题，即核心家庭阻止孩子进行轻松过渡、与他人建立关系；也无意探讨心理学家由此产生的适当调节可以避免上述危机的观点。我们探讨的是，在社会的整个组织架构中，家庭、学校和工厂都是一种贫民窟化了的区划。所以从一个区划到另一个区划的过程是充满痛苦的。这种痛苦无法通过修补贫民窟区划之间关系而减轻，只能通过摧毁各个贫民窟而消除。——原注

[8] “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是某部分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众多的口号之一，旨在将年轻学生的斗争与工人和大学生联系起来。——原注

[9] 在英国和美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ans J. Eysenck）和詹森（Arthur Robert Jensen）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人的“智力”要比白人低，而诸如伊里奇（Ivan Illyich）之类的进步教育家的观点却恰好相反。他们的目标一致，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不一样。在

任何情况下，心理学家都跟其他人一样是种族主义的，只不过心理学家更直接罢了。“智力”是一种从敌人身上发现智慧的能力，是一种在此基础上塑造自身逻辑的能力。如果整个社会都在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基础上运行相关体制，那么无怪乎这些心理学家会认为通过有意识的彻底“调节”，即使不读书孩子们也不至于去做莫洛托夫燃烧瓶。伊里奇非常关心儿童“成绩不佳”的现象（即儿童拒绝“智力”），他的一个合理观点可以说明问题。——原注

[10] 尽管是资本在管理着学校，但控制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人阶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发起挑战，拒绝承担资本主义教育的代价。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应是重新建立自己的控制权，并在工厂之类的地方进行更严厉的控制。甚至在我们写作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绞尽脑汁地构思更复杂的教育政策。我们只能在此指出新政策的动力：（a）就算工人阶级青年成了白领，使用打字机和绘图板而不是铆接机，他们拒绝那种培养他们进工厂的教育；（b）中产阶级青年拒绝在阶级间扮演调解员的角色，拒绝当调解必备的压抑人格；（c）更大的工资和地位差异需要新劳动力。目前的平均主义趋势必须扭转；（d）创造新型劳动过程，试着吸引工人“参与进来”而不是拒绝接受现有的单调和碎片化的流水线。如果青年拒绝接受传统的“成功之路”乃至“成功”本身，那么就必须要让青年找到新的目标了，这样他们才会去上学、工作。“免费”教育中的新“实验”鼓励儿童参与教育规划，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变得越来越民主。如果这样便认为资

本失利了，就是产生错觉了，认为管制将取得胜利也是一样。因为在创造以新颖的方式接受操纵的劳动力的过程中，资本甚至不会损失0.1%的利润。“事实上，”他们会说，“只要还在我们的地盘，你走自己的路，于我们而言其实是更加高效的。”在工厂和社会工厂的某些地方，资本的口号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自由和互助将保证甚至扩大平等”。——原注

[11] 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autonomy，又译“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他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去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同时又强调，虽然这些群体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会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因为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这些自主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展开自我的直接行动。

[12] 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也包括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生产方式、各种财产等。

[13] 此刻我们绝不是忽视为了得到试管婴儿而做出的尝试。但在今天，这样的机制完全属于资本主义式的科学控制。使用试管婴儿将彻底背离我们，背离整个阶级。放弃生育、拱手让给敌人不是我们利

益之所在。争取生育自由才是我们利益之所在，我们既不会为工资付出代价，也不会为社会排斥付出代价。——原注

[14] 假如不借助技术创新而只用“人文关怀”来抚养孩子，那么就只能通过妇女运动和妇女斗争来有效地从家务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让家务劳动发生质变：运动的规模越大，男性——首先是所有的政治激进分子——就越不会依靠女性来照看孩子。与此同时，运动构建的新社会氛围为儿童、男性和女性提供了社会空间，而这与国家组建的日托中心无关。这已经是斗争的胜利了。正是因为这是由本质上属于一种斗争的运动所带来的，所以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斗争而替换任何种类的“合作化”。——原注

[15] 在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中，“性”（sexuality）指的是一系列聚集于某种生殖器感受（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殖器）有关的行为、期待，叙事、愉悦、身份认同和知识。见何春蕤《性 / 别研究的诞生》，收于《性 / 别研究的新视野（上）》（元尊文化 1997 年版）。

[16] 无法确定这些趋势会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无法确定这些趋势何时才能调转方向。——原注

[17] 一些英文的读者率先发现，妇女工作的定义可以更加准确。我们确切的意思是，作为工作的家务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是具有生产性的，即产生剩余价值。我们随即讨论了整个女性角色的生产力。如果希望从工作和整个角色两方面弄清楚妇女的生产力，请见我们正在写作的另一篇文章。本文是从整个资本主义循环的角度就妇女的位置进行了

详细的探讨。——原注

[18] 见《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的前言。——原注

[19] 然而，这正在被反向趋势所抵消，即让妇女进入某些特定部门的行业中。行政部门内资本的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甚至对立的宣传和政策。在过去，家庭的稳定性是以相对标准的神话（政策和宣传整齐划一、由官方宣布且无异议）为基础的，而今天资本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矛盾，推翻了家庭作为一个稳定、不变、“自然”单元的定义。与此相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生育控制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财政政策，如英国政府最近将生育控制资金拨款增加了一倍。我们必须探究在多大程度上这一政策与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相关，即对成熟劳动力来源的操纵；在多大程度上与不断削弱的职业伦理导致了得不到支持的失业母亲发起运动相关，即生育控制通过产生具有革命性的孩子，污染了资本的纯粹性。——原注

[20] 这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一项政策，他们多年前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给年满五十五岁的在家妇女发放一笔养老金，其中既包括家庭主妇也包括单身妇女。但该法案从未通过。——原注

[21]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给家庭主妇付工资，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妇女运动中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小。文件起草后（1971年6月），相关辩论也变得愈加深刻，由讨论的相对新颖性而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也渐渐消除。但是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妇女需求的重要性不仅激化了运动的需求，还给了我们更大的力量和信心来向前发展。一年前

意大利运动刚开展时，仍有人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每月为家务劳动支付七至八英镑的津贴，来轻易地镇压妇女对家务劳动的反抗，因为连依靠养老金生活的“地球上的受苦人”都有津贴。如今这些不确定性大部分都消失了。人们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的要求只是一个基础，一个视角，并以此为出发点继续向前发展，工资要求的优点主要是将女性的压迫、服从和孤立与其物质基础——女性剥削——联系起来。此时此刻，这可能才是家务劳动工资需求的主要功能。这立即为斗争做出了指示，指出了组织的方向，压迫和剥削与种姓和阶级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视角的一个常见的实际应用是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运动所要面临的任务。——原注

[22] 我们对食堂的看法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关于家务劳动的工资，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讨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混乱。如前所述，家务劳动可被制度化成为工厂工作，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摧毁这两个制度。但是除了我们提出的要求外，关于要求本身仍然存在着误解。这个目标不仅是一件东西，而且如任何时候的资本一样，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对抗的阶段。不管赢得的是食堂还是工资，都是我们依靠斗争的力量所取得的胜利或打赢的胜仗。建立在这种力量之上的是，这一目标是否会变成资本对我们劳动进行合理控制的契机，是否会变成我们削弱资本对我们劳动进行控制的契机。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时，目标的各个组成部分，不管是工资还是食堂抑或是自由的生育控制，都将得到提升、出现，事实上这些都是由斗争创造出来的，代表

了我们在斗争中实现相关权力的程度。——原注

[23]“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原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561 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编注）

[24] 纽约的一个社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黑人社会中史无前例的艺术勃发期。

[25]“但是，另外一个较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将在本书的以下各章加以发展，这个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不同意工资协议可以直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这一假设条件。……我们将致力于证明：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的是某些其他的因素……我们将进行争辩并且指出：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一方面的运行，一向存在着原则性的误解。”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高鸿业译，第 18 页——编注）。我们认为“其他的因素”首先是指妇女。——原注

[26] 我们已经注意到，1917 年之后，很多布尔什维克在落魄贵族中找到了女性伙伴。当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关系中，权力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时，妇女依然是“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见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央编译局译，第 119 页——编注]。“新沙皇”的产生说来话长。《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决定》（1921）中“妇女工作”的第一部分写道：“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确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即不存在‘特定的妇女问题’，不存在‘特定的妇女运动’，劳动妇女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各种联盟，以及来自于拥有社会妥协者和机会主义者式奸诈手段的妇女工人的任何支持，都会破坏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了结束妇女的奴役，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理论是男性的，在实践中需要“中和”。让我们引用另一位创始人的话：1922 年 3 月 26 日，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妇女大会上，“葛兰西同志指出，家庭主妇构成了无产阶级妇女中的绝大多数，必须在家庭主妇间发起特别行动。他说她们应该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建立起的特殊组织发生联系。只要人们还关心家庭主妇的工作质量，家庭主妇就同工匠类似，因此她们也很难成为共产主义者；然而，由于家庭主妇是工人的伴侣，由于她们以某种方式与工人们一起生活，所以她们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因此我们的宣传便可以影响到这些家庭主妇；就算不能把家庭主妇带进我们的组织，至少也能中和她们；这样她们就不会妨碍工人们展开斗争了。”（来自《伴侣》第一年度第三期 [1922 年 4 月 2 日]，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中一个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原注

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Silvia Federici

以小册子形式发表，1974 年。

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

他们称之为冷淡。我们称之为旷工。

每一次流产都是工伤。

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工作条件……

但同性恋是工人掌握生产，而非结束工作。

更多的笑容？给更多钱吧。没有什么比钱更能够摧毁笑容的治愈功效了。

神经衰弱、自杀、去性化：家庭主妇的职业病。

在讨论家务劳动工资时，很多妇女都会表现出种种困难和犹豫，因为她们把家务劳动工资还原为一种物、一沓钱，而没有将之视为一种政治态度。这两种立场差别巨大。将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物而非一种态度，会使我们斗争的最终成果与斗争本身相分离，并使我们失去其对于打破和颠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限定的角色的意义。

当我们这样还原式地看待家务劳动工资时，我们是在

自问：更多的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不同？我们甚至可能会同意，对于很多除了家务劳动和婚姻之外别无选择的妇女来说，更多的钱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但对于我们这些似乎有其他选择——专职工作、开明的丈夫、社群生活方式、同性恋关系，或者这些兼具一一的妇女来说，更多的钱根本不会为我们带来太大的区别。对于我们来讲，但凡有别的方式实现经济独立，成为家庭主妇只会是别无他选时才愿意用来实现经济独立的手段。正所谓，这种命运可以说是比死更糟糕。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通常只是给我们当前的糟糕生活多加上一点钱，然后在错误的前提下问道：“那又怎样？”错误的前提在于，我们努力争取那笔钱的同时，不会使我们全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革命化。但如果我们将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政治态度，那我们就会看到，争取它的斗争将会在我们作为妇女的生活和社会权力中造成一场革命。显然，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这笔钱，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身体和心灵特殊的卖淫形式，并由此得到钱来掩盖那种需要。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家务劳动工资不仅是一种革命态度，而且也是唯一一种从妇女主义立场并最终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态度。

“爱的劳动”

当谈论家务劳动时，我们所谈的不是一种与其他工作一般的工作，而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各成分施行的最无处不在的操纵和最精致隐秘的暴力。诚然，在资本主义中，每个工人都受到了操纵、遭受了剥削，并且他 / 她与资本的关系也被完全神秘化了。工资给人一种公平交易的印象：你劳动，你得到报酬，因此你跟你的老板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报酬不是为了偿付你的劳动，而是为了隐藏所有转化为利润的无偿劳动。但工资至少承认你是工人，你可以就工资、工作的条件和数量进行谈判和斗争。领工资意味着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你之所以工作，不是因为你喜欢工作，也不是因为工作自然而然地找到你，而是因为只有工作你才能生存。尽管可能备受剥削，你也不是那份工作。今天你是邮递员，明天可以是出租车司机。重要的是你要干多少工作和你能从中得到多少钱。

但对于家务劳动，情况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家务劳动被加诸妇女身上，而且还在于它被转变成了我们妇女体格和人格的自然属性、内在需求、渴望，据说源自

我们妇女特质深处。家务劳动被转化成一种自然属性，而没有被视为工作，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妇女体制出现以来，它就注定是无工资的。资本必须让我们信服家务劳动是一种自然、不可避免甚至令人满足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无偿劳动。反过来，家务劳动的无工资状态也成了巩固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这一惯常说法的最有力武器，从而防止妇女展开除私家厨房一卧室吵架（全社会都觉得这种吵架是可笑的，从而会贬低斗争的主人公）之外的斗争。我们都被视为唠叨的泼妇，而不是斗争中的工人。

但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社会化过程——日复一日的培训，才能让一位妇女做好成为无工资母亲的准备，才能使她相信孩子和丈夫是她能从生活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这表明了成为家庭主妇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它也很难成功。无论我们多么训练有素，当婚礼结束后面对抗脏的水槽，很少有妇女不会觉得上当受骗。我们当中还会有很多人抱有幻想，觉得我们是为爱而结婚。我们当中有些人承认我们是为了钱和安全感才结的婚；但是时候进行澄清了：尽管婚姻中的爱或金钱寥寥无几，但等待我们的工作却是堆积如山。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妇女总会告诉我们：“抓住一切机会享受自由，现在想买什么就尽管去买吧……”但不幸的是，如果从小便接受训练，学会顺从、

屈从、依赖，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甚至从中得到乐趣，那你就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自由。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特质，那是你的问题、你的失败、你的罪孽，你不正常。

我们必须承认，资本在隐藏我们的劳动成果方面非常成功。它以妇女为代价，创造了一件真正的杰作。通过否认家务劳动有工资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爱的行为，资本一石多鸟。首先，它得到了多得要命的免费劳动，并确保远离反资本斗争的妇女，会把家务劳动当成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这句话颇有魔力——“是的，亲爱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与此同时，通过让他的女人依赖于他的工作和工资，资本也规训了男性工人，并且通过给这些自身仆役于工厂或办公室已久的男性工人配备一名仆人来将他们禁锢在这种规训之中。实际上，我们作为妇女的作用，是要成为“工人阶级”（即资本为获得更多社会权力而役使的无产阶级阶层）无工资但快乐的（最重要的是爱）仆人。就像上帝创造夏娃是为了给亚当带来快乐，资本创造家庭主妇，也是为了在体力、情感和性等方面服侍男性工人——抚育他的孩子，缝补他的袜子，修补他被资本带来的工作和社会关系（孤独的关系）摧毁的自我。妇女必须为资本承担体力、情感和性的服务。正是它们的独特组合，塑造了家庭主妇的仆人性，使她的工作如此繁重却又

不可见。大多数男性一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会开始考虑结婚，这绝非偶然。这不仅因为他们现在负担得起结婚了，也由于只有家里有照顾自己的人，才不至于在流水线和办公桌旁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发疯。所有妇女都知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并拥有一段“成功的”婚姻，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越穷，妇女遭受奴役越严重，但这不单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实际上，资本采用双重政策，一种政策对付中产阶级，一种政策对付工人阶级家庭。我们总能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找到最质朴的大男子气概：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打击越多，妻子就越必须学会消化这种打击，男性就越会以她为代价来恢复自我。在因为工作而沮丧或疲惫不堪的时候，在斗争失败的时候（进工厂本身就是一种失败），你殴打你的妻子，冲她发泄你的怒气。男性被使唤得越多，就会越厉害地使唤别人。家就是男性的城堡……他心情不好时，他的妻子必须学会安静地等待；他垮掉、咒骂整个世界时，他的妻子必须学会使他复原；在他说“今晚太累了”或做爱太快（如一位妇女所言，他简直跟好像在跟蛋黄酱罐子做爱）时，妻子必须学会在床上风情万种。（妇女总能找到反击或报复他们的办法，却总是采用一种孤立和私下的方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让这种斗争从厨房和卧室走上

街头。)

这种以爱和婚姻之名进行的诈骗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即便我们还没结婚），因为一旦家务劳动完全自然化和性别化，一旦它变成了妇女属性，我们所有作为妇女的人都将受到它的规定。如果做某件事是自然的，那么人们便会期望所有妇女去做那件事，甚至应该喜欢做那件事——尽管有些妇女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可以逃避大部分或部分的家务（她们的丈夫能够负担起女佣和心理医生，以及其他放松和娱乐形式）。我们也许不是在服务一个男人，但是我们全都身处与整个男性世界的主仆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妇女意味着被贬斥、意味着低人一等。（每个男人都觉得有权问你：“笑一笑，甜心，你出什么事了？”不管他是你丈夫，还是火车上的检票员，亦或是你的老板。)

革命态度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便能看到家务劳动工资要求的革命内涵。这种要求会终结我们的自然本性，开始我们的斗争，因为只是希望得到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我们拒

绝承认这种工作是我们自然本性的表现，并因此明确拒绝接受资本为我们发明的妇女角色。

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本身就会削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而正是这些期望——我们社会化的本质所在——使我们在家中处于无工资状态。就此而言，将妇女争取工资的斗争与工厂男性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相提并论，是荒谬的。雇佣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确挑战了他的社会角色，但却仍然处于这个角色范围之内。当我们为工资而斗争时，我们是在毫不含糊、单刀直入地去反抗我们的社会角色。同样，雇佣工人的斗争和奴隶争取得到工资、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然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为工资而斗争，不是在争取进入资本主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们是在争取打破资本对妇女的规划，而这也是资本为维持其权力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有计划地分工和社会权力分化的关键环节。家务劳动工资之所以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不是因为其本身破坏了资本，而是由于它攻击资本，迫使资本以更有利于我们并最终更有利于阶级团结的方式重构社会关系。实际上，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得到了报酬，我们会继续承担家务劳动。情况恰恰相反。做家务劳动要求付钱，是拒绝家务劳动的第一步，因为争取工资让我们的工作变得

可见，而这是展开反对家务劳动（无论是其作为家务劳动的直接方面，还是其更为隐秘的性质，例如妇女气质）的斗争的必要条件。

不同于一切“经济主义”^[1]的指控，我们应该记住，钱就是资本，即控制劳动的权力。因此重新占有作为我们、我们母辈以及祖母辈劳动成果的钱，同时意味着破坏资本迫使我们进行劳动的权力。我们也不应该怀疑工资有力量使我们的妇女气质去神秘化，并使我们的工作——作为工作的我们的妇女气质——变得可见，因为无工资非常有力地塑造了这种角色、掩藏了我们的工作。争取家务劳动工资使这一点变得可见：我们的心灵、身体和情感都为了一种特定功能并在一种特定功能中遭到了扭曲，而且之后被作为模板扔回给我们，我们如果希望被社会接受为妇女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个模板。

我们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是要揭露一个事实，即家务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就是金钱，资本已经并一直从我们的烹饪、微笑和做爱中赚钱。同时这也反映出，我们之所以经年累月地烹饪、微笑和做爱，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些比其他人更容易，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脸庞因为笑得太多而扭曲，我们的感受因为爱得太多而麻木，我们的过度性化使我们完全被去性化。

争取家务劳动工资只是开始，但其中传达的信息却是明确的：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给我们报酬，因为作为妇女我们不再保证做任何事了。我们想把家务劳动也称为工作，这样我们或许会重新发现什么是爱，并创造出我们前未知的性状态。从工作的视角来看，我们能要求许多笔工资，因为我们被迫同时从事多项工作。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心理医生；这就是“母亲节”所欢庆的“英雄”配偶的本质。我们说：别再庆祝我们的剥削、我们所谓的英雄主义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家务劳动都要得到报酬，这样我们就能拒绝一部分家务劳动，并最终完全拒绝它。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显示我们的妇女美德具有一种可计算的货币价值更有效了：直到今天只有资本伴随着击败我们的程度而相应地增长；从今以后，我们根据自己力量的组织程度来为我们反抗资本。

争取社会服务的斗争

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激进的态度了，因为尽管我们可以要求一切，日间护理、同工同酬、免费的自助洗衣店，但除非从根本上攻击我们的妇女角色，否则我们永远

无法取得任何实质的改变。如果我们不率先确定我们的工作也是工作，那么我们争取社会服务（即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只会不断遭受挫败。除非我们反抗总体，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取得胜利。我们争取免费自助洗衣店的斗争会归于失败，除非我们首先反抗我们只有无穷无尽地工作（这种工作正日复一日地摧残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爱的事实；除非我们首先逃离这种勒索，由于这种勒索，我们施予和接受爱的需要都作为一种工作职责（由于这种职责，我们只能一直不满自己的丈夫、孩子和朋友，并对这种不满产生罪恶感）转而反对我们。就像年复一年的妇女家外工作所见证的那样，找兼职工作也无法改变那种角色。兼职不仅使我们遭受更多剥削，而且还以其他形式再生产了我们的角色。无论往哪儿看，我们都能看到妇女从事的工作不过是家庭主妇状态全方位的扩张。我们不仅成了护士、女佣、教师、秘书——我们都在家里为所有这些职能接受了良好的培训——而且还受到在家中阻碍我们斗争的同一个障碍的规训：孤立，其他人得靠我们才能生活的事实，还有无法看到我们的工作在哪里开始、何处结束、我们的欲望在哪里开始的事实。给老板倒咖啡，跟他聊聊他的婚姻问题，这属于秘书工作的一部分吗？还是属于个人帮助？我们不得不注意

上班时的仪容，这属于工作条件吗？还是妇女虚荣心的结果？（直到最近，因为害怕遭到解雇，美国的空姐还需定期称重和长期节食，这种折磨每个女人都知道。）人们常说，当雇佣劳动市场需要她的存在时，“一个女人可以在不丧失妇女气质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工作”，这干脆意味着你不管做什么，都只是个女人。

至于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集体化的建议，几个例子将足以说明这些替代方案和我们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区别。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建立一个日托中心、要求国家为此买单是一回事。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国家，让国家不是五小时而是十五或二十四个小时地控制、管教和教育他们以美国国旗为荣，则是另一回事了。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组织公共聚餐（我们自己操办，集群聚餐等等），然后要求国家为此买单是一回事，要求国家组织我们的用餐则是截然相反的事情了。在一种情况下我们重新得到了生活的控制权，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却助长了国家对我们的控制。

反对家务劳动的斗争

一些妇女会说：家务劳动工资将会怎样改变丈夫对我

们的态度？一旦我们得到了工资，丈夫难道不会继续希望我们承担跟以前一样甚至更多的职责吗？但这些妇女没有看到，男性之所以能对我们有这么多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报酬，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女人的事”，不会花费我们太多精力。男性之所以能够接受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得乐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我们也会因为是为爱做这些事而乐在其中。他们确实期望我们感激，因为通过娶我们或与我们生活，他们给了我们作为妇女表现自己（即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他们会说：“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你的幸运。”只有当男人将我们的工作看成工作——将我们的爱看成工作——并且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拒绝两者的决心时，他们才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只有当成百上千的妇女走上街头，说出无休无止的清洁工作、总要在感情方面做好准备、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被迫做爱很难受，讨厌的工作浪费我们的生命时，他们才会感到害怕，并为自己身为男人而感到沮丧。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能发生的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因为通过揭露资本分化我们的方式（资本通过我们规训男人，又通过男人规训我们——彼此反对），作为男人的拐杖、奴隶和锁链，我们开启了他们的解放进程。因此家务劳动工资将比努力证明我们和他们有相同的工作能力、我

们能从事同样的工作更有教益。我们把这种富有意义的努力留给“职业妇女”吧。她们摆脱压迫，靠的不是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而是主人的力量、压迫（常常是其他妇女）的力量。我们也不必证明我们能够“打破蓝领障碍”。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打破了蓝领障碍，并发现工作服并没有赋予我们比围裙更多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力量甚至会更少，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既穿工作服也穿围裙了，所以投入反对它们的斗争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揭露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揭露资本在反资本斗争中对我们和我们的力量的所作所为。

不幸的是，很多妇女——特别是单身妇女——因为害怕被认定为家庭主妇，而畏惧家务劳动工资的态度。她们知道家庭主妇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无力的地位，所以她们不想意识到自己也是家庭主妇。这正是她们的弱点，这种弱点因为缺乏自我认同而维持下来并长期存在。我们想并且必须说的是，我们都是家庭主妇，我们都是妓女，我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奴隶身份，我们才能承认我们反对它的斗争，因为只要我们认为我们是比家庭主妇更好、不同，我们便接受了主人的逻辑（即一种分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种奴役的逻辑。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因为不管我们身处何地，他们总可以要求我

们做更多工作，使我们提出要求时更为恐惧，并使他们有更少金钱压力，因为我们头脑中充满期望，希望现在或未来会出现一个男人来“照顾我们”。

我们一直在欺骗自己以为能够逃离家务劳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尽管在家外工作，却逃脱了家务？我们真的能够那么容易无视与男人生活的想法吗？如果我们失去了工作会怎么样？当我们年老色衰，失去了年轻（生产力）和魅力（女性生产力）在今天赋予我们的微小力量时又怎样呢？孩子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后悔没要孩子，甚至在现实中根本没法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能承担起同性恋关系吗？我们愿意为孤立和排斥付出代价吗？但我们又真的能负担得起与男人的关系吗？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只有这些替代方案，并且什么样的斗争才能使我们超越它们？

纽约，1974年春

马 新 译

朱 剑 校

[注释]

[1] 经济主义 (economism)，一种认为对工作阶级的关注只需要透过改善生活条件来达至、而不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信仰。

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

塞尔焦·博洛尼亚

Il rapporto società-fabbrica
come categoria storica

Sergio Bologna

发表于《五一》第二期，1974年。

《阶级》^[1]编辑部起草了一份“透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调查问卷”，并寄给了意大利境内多个参与战斗性研究和讨论的组织与刊物。这份问卷的目的是要“全面评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现状……评判（尤其是1968—70年的）群众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方法和内容，以及近期实现的‘一百五十小时’诉求对它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下札记最初是准备作为《五一》^[2]策划的汽车业工人阶级史讨论的引言。我已将其重写，以便部分地回应《阶级》提出的问题——之所以部分，是因为它们将自己限于菲亚特公司历史反映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1960年开始考察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一年是人们在1945年后首次谈论把工人阶级运动纳入政府舞台和社会管理。即便经历了1950年代的失败，意大利共产党还是颇为自满，因为它是唯一预料到赫鲁晓夫一百八十度转向的党，代表着广泛的观念谱系和政治联盟，并且在文化上是开放的（实际上非常开放）。这种开放使许多“非

有机”知识分子与党的文化政策联系起来。党的影响遍及电影制片厂、出版社、艺术界和学术机构：这是对其开放政策的丰厚回报。或许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取得的。葛兰西的著作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和完美的历史学方法。他甚至能使其他人摆脱克罗齐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影响。此外，在开始批判意共文化史和意共党史本身时，非共产党历史研究在其核心也是葛兰西式的。我们（以及尤其是《阶级》的一些编辑）都记得，“斯大林主义历史编纂学探讨”过分地批评了亲共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指控他们搞护教学——尽管实际上对于亲意共历史学家来讲，护教学的指控未必公平，尤其是当你把他们与法国人和东德人相比较时。他们所奉行的，与其说是构成障碍的护教学或个人崇拜（例如，即便“正统的”东德历史学家，也曾研究远非无关紧要的一战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结构），还不如说是由葛兰西提出并成为意共政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意大利历史独特、机敏、灵活和富于启发性的解释。因此，一切“纠察队”的观念都是虚幻的——任何不是同时为新组织而战的文化战斗都被看成浪费时间。感觉是，如果我们证明能够在政治组织层面有所收获，那之后或许就能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来看看作为葛兰西方法拱顶石的“霸权”范畴（egemonia）——即政治阶级与其表现同时超越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因为占据霸权地位的政治阶级所反映的层面，绝不仅是其社会基础所掩盖的，而是更为广泛和明显。让我们考察一下“霸权”这个范畴在我们亲爱的两个主题上——即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和美国主义——是如何作用的。葛兰西是这样谈论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这是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联盟，主张同农民，首先是同南方农民^[3]结成联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初步的、原始的，但是是很健康的。准确地说，工团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南方农民领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软弱的尝试。”^[4]关于美国主义，他写道：“在形式上最完善的美国主义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而探讨这些问题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个条件予以注意，因为这个条件在美国是自然存在着的：这个条件可以称为‘合理的人口成分’，它在于缺少在生产范围内丝毫也不起一点重要作用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也就是绝对寄生的阶级。”^[5]他最后总结道：“霸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须要最小数量的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6]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层面：万物的社会（societas

rerum) 和人的社会 (societas hominum)。即便对葛兰西来说, 历史正是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 但葛兰西式的历史编纂学却认为, 人的社会是压倒性的——也就是说, 把政治机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当作一种独立的东西。这些当代葛兰西分子认为, 为了能够建设恢复人类之间新关系——即阶级之间的一种权力平衡——的缓慢、艰辛、困难的道路 (只有工人阶级和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够分别直接地和间接地走上这条道路), 而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将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 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一切企图都不得不包含这两个环节——人的社会如何转变为万物的社会, 以及反之。从社会到工厂, 到阶级冲突。就此来讲, 只有由工人阶级暴力所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其他的都只是生产关系的附属物——即附属于资本的社会、政党或者机构。

摆脱葛兰西“霸权”方法论诱惑的魔爪是不容易的。尽管如此, 还是有必要与这样一种历史学家决裂: 他们或多或少都对“万物的社会”花费过笔墨, 但始终都把“万物”——即“经济要素”——当作与人相分离的东西, 将它们封闭在单独的章节中 (在那里, 奇怪的数字、索引或图表提醒着分神了的读者, 教授现在在谈论“经济学”, 在

阐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最激进的解决方案是将两个层面减为单独一个层面——换言之，清除霸权概念的基础。或许在这一方面，特龙蒂在《红色手册》上的论述可谓最激进的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关系成了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社会整体成为生产的表现。换言之，社会整体成了工厂的一个机能，工厂将其独断专行的支配加诸社会整体之上。在此基础上，政治国家机器日趋具有了集体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产，并因此成了资本家的机能。将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进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独特的发展历程所造成的，它绝对无法容忍一个即便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的政治领域的存在。”

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7]的压力使《红色手册》抛弃了霸权概念。随后的实践和理论发现（但也有政治和科学局限），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特龙蒂的上述文字。这些发现是通过劳动—权力经历其一切关节点的漫长历程后而达到的，以实现空前水平的阶级重组——简言之，即1968年的事件。学生、技术员、边缘无产者、失业者和非有机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大工厂工人阶级的指挥。没有什么能替代那种阶级分析。要么由于仍然与旧腔调（农民、小

资产阶级学生、流氓无产者等等）紧密相连要么因为太过深陷第三国际社会学主义而拒斥它的人，无法提供替代性的视角。可一旦组织问题以这些新的方式被摆出来，就必须找寻一种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这不是一个渐进主义的问题（从工厂斗争到社会；从工资斗争到等级制）。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当时完全必须找到回应国家挑衅的方式。在1969年12月12日的事件之后，怎么还可能把“国家机器”等同于“集体资本主义”呢？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纷纷从自己的旧武库里拿出似乎适宜情况的公式：武器锈得最厉害的人，反应往往最快。

1970年见证了极端列宁主义黄金时代的开端——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童年。在理论和组织层面上，是进两步又退两步。但在历史编纂学层面——回到我们的主题——则无疑为意共老近卫军们通过生产自传产品（这或许是官方群体 [official quarters] 对工人阶级运动史最有效、最货真价实的贡献了）除掉各自喉中骨鲠提供了最适宜的氛围。

所以在1962年，特龙蒂的奠基和《阶级》的工作并没有在历史学原则方面产生值得一提的结果。但却发生了一些可能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任何复兴工人阶级运动的进程，任何与旧政治组织的战略决裂，任何对工人阶级历史

编纂学的重建，现在都与菲亚特的工人、与都灵所表现的城市—工厂关系（rapporto città-fabbrica）牢牢地关联在了一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回到了衔接葛兰西著作的问题。都灵和菲亚特是直接生产领域吸纳政治领域的范例。正是在这里，如葛兰西所言，“霸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须要最小数量的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它是意大利境内唯一“美国化”的地方，是唯一有着“合理的人口成分”的地方。

在此，对于轻视组织的形式层面的态度，对于认为党已经完全包含在阶级之中，因此只需措辞恰当的传单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观点，我们是否或许应该对其追根溯源？或许应该。但确实正是它造成了将组织设定为在生产关系自身之外的“独立”领域的必要性。这让我想到那么一些人，他们或者鼓吹“政治自治”来解释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相关的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剪刀运动（scissor-movement），或者主张“意志乐观主义”，造成一种完全基于主观主义之上、明确排斥任何并非纯粹“服务”（servizio）的群众领域的组织理论。但现在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历史编纂学层面得出一些方法论的结论。将社会整体看成生产的表现，这种拒斥独立于社会关系的政治领域的观点，会造成政治历史编纂学（或者政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消失，同

时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将经济史作为一般社会史的基础构件。事情发展到，人们觉得，老“劳动过程史”的方法比起整个从政治机构角度看待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编纂学传统，是更为有效的工具。首先受到这种态度影响的是，反法西斯史和抵抗运动史：它们被视为本质上空洞和奴性的。被考察的实际问题是，战后反法西斯政治阶级如何以及为什么使自己成为一种保证社会生产并确保剥削关系继续的过渡要素。[……]

对于《红色手册》，我们曾说，它的工厂概念太过极权，以至消解了所有其他政治层面。我们未曾说到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另外一个既是分析又是工人阶级攻击的对象——即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国家。在这种视角下，重新评判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就变得很迫切了。由此，研究进入了大财团（alta finanza）与统治等级之间的关联与勾结——谁给谁付钱，谁妥协或没有妥协——简言之，即便清洗已经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它开始过），揭露寡头统治的成员也根本不是功能性的。相反，人们需要做的是，找出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一个环节的根源。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既注重对发展的量化评判，也注重对社团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逐渐打破了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落后性的旧神话。它们

也破除了法西斯主义造成停滞并使之持续存在的图景。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社会被视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构（尤其是更为先进的工业国）有着相当大的同质性。如果不深入其理论根源和运行手段，描述集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又何以可能呢？这便解释了对凯恩斯和阿尔弗雷多·罗科、亚尔马·沙赫特和罗斯福的兴趣。

但与垄断分析相关的另一点或许更为重要。1961年见证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在意大利的出版，这就使人们能够考察共产国际对垄断的本质进行讨论的根源。从希法亭到列宁，从列宁到季米特洛夫。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部分和农业阶级以及国家官僚结成的联盟，被视为与垄断和法西斯主义密不可分。因此，停滞的根基在于寄生资产阶级——金融资本^[8]，那张收入、商贸来源、农业来源（虽然与银行相关）的密网，和倾向储蓄的小资产阶级一道，组成了保守主义（它阻碍了更广泛的劳动力再生产进程）的“法律与秩序”阵营。这在客观上汇聚了社会“生产”部门中的防御性利益——即被激进派和自由派支持的纯粹资本、工人和雇主——也就是说，在垄断下受窒息的自由资产阶级。

这一纲领对于爱迪生^[9]或意美航运公司^[10]或许有用（并因此似乎适合专制制度的发展），但对于那些处于危机

中并被工业重建研究所^[11]控制的产业部门（海军、造船、钢铁），却是不够的。对于菲亚特，它也毫无作用。或许只有在今天——美元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检讨马克思的货币问题（在热衷于考察凯恩斯货币理论时，我们忘了《资本论》所说的货币的功能）——我们才能够回过头来讨论信用和危机，讨论与信用制度相适应的“其他资本因而其他劳动的有效性”和国家在危机中扶持一个个资本家、使资本家剥夺全部剩余价值时恢复行使资本代理人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政治功能之间的必要关联。因此，工业重建研究所的作用绝不是国际危机导致的动荡情况下提供紧急补贴；因此工业重建研究所的“私有化”根本不是对其初衷的背离，也不是资本社会化计划的倒退。工业重建研究所是向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指挥功能的个体资本家进行投资的国家分支。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利润率！这个关注的方面成了第二位的。它绝不是政治上最相关的方面，而是重构进程第二位的、技术性的现象。同理，国家信用与工业之间的类似关系也不能被认为是资本的反常运作：应该说，这种关系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信用的章节中所描述的东西。

一方面，1964 年以来我们在组织层面最初的尝试使

我们面对伴随货币（因此也有信用）措施发生的经济转折和衰退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贫民窟中的斗争在实践方面削弱了很大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尤其是与大工厂工人（一些人在非正式评论中称之为“大众工人”）相关的穷人、次无产阶级、妇女等理念。还有另一个城市——工厂、“作为工厂的社会”的理念，另一个“美国主义”的理念：通过暴力，贫民窟实现了对工厂的霸权。此外，尽管我们试图将该模式运用于来自南方的意大利移民之上，但这种以肤色为基础的特殊社会划分仍然是专门美国式的剥削法。此外，1964年也是伯克利^[12]和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年份，是白人激进运动（在1967年与欧洲的学生运动合流）大觉醒的开端。我们要把这些学生置于何处？见鬼！我们所有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范畴框架都陷于混乱。一场灾难！那之后，我们当中还有人坚称，越南战争是一场农民战争，并且因此是争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没有理解单纯农民和武装农民的区别，没有预料到（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同样那群农民会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危机。遵循其他一切学术原则的历史编纂学，闭上双眼，装聋作哑。尽管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人强烈欲求摆脱和替换我们的“原则”。这是创造双重文化市场的年代——官方市场和“运动”市场。它对出版业是有用的，

因为这个当时处于危机中的行业能够使自己的产品变得多种多样，来覆盖这两个市场。

在战斗性历史编纂学方面，德尔卡里亚^[13]的《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填补了鸿沟。但它后继无人。谁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就像我们开头所看到的，历史编纂学只是“后知”之学，只在组织进程进行总结时才现身。

实际上，1968—1969年见证了整整一批新政治活动家。就像曾是都灵的“美国主义”一样，菲亚特又一次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且整个运动似乎都受到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54号车间工人的指挥。1962年，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着手撰写共产主义运动史；但1969年，这个小众群体已经能够与群众运动打成一片了，并且阐释的关键点又一次是“阶级构成”和“大众工人”的理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葛兰西上述引文中所称“合理的人口成分”（*composizione demografica razionale*），但对我们而言，阶级组成意味着与单纯的劳动力结构及其按照职业、技术水平或收入而进行的分层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通过阶级组成所理解到的东西，非常不同于这整个社会学的和工团式的阐释——对我们来讲，阶级组成意味着斗争经验、主观态度、意识形态沉淀和特定阶级整体的自发行为的综

合。对资历、技术水平、年龄、出生地这样的因素（即一切所谓“客观”因素）的规定当然包括在阶级组成的理念当中，但并不构成其本质。所有这些都对我们规定自己的组织纲领和工作方式有重要影响，但像一些人仍然宣称的那样，因此阶级组成和组织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关系，由此政治纲领从属于阶级组成，就是错误的了。

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阶级组成中，大众工人是先锋和动力。尽管在这种讨论中有许多后共产主义因素，尽管将二十世纪划分为技术工程工人（被视为意识形态化的和第三国际分子）阶段和流动大众工人阶段（被视为异端和用户至上主义者 [consumista]）得到了确证，尽管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责任，但回过头来开始遵循汽车产业史（尤其是菲亚特的历史）提供的非常单纯的路线处理问题，或许是有用的。因此，下面的文字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预备性的纲要。但首先，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我有必要做些澄清：我并不想“摧毁”葛兰西，尤其是因为他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14]中处理了与我们时代关联密切的政治问题。

首先，要仔细考察泰勒主义（参见接下来的文章《菲亚特历史日志》^[15]），我们就必须将工作的科学组织的发

展从大工厂群众化问题中剥离出来。泰勒至死都只重组过美国的中型工厂，但遇见过例如雷诺（他从泰勒那里获得了切割钢板新系统和钢铁快速生产规程）这样的人。阿涅利^[16]将自己的工人“泰勒化”的企图，虽然在1919年因其工厂被占领而未能实现，但之后1921年4月危险刚一过去，就着手展开了。人们能否因此认定，欧洲大汽车工厂比“工人阶级社团主义”抵抗更为强烈的美国大工厂更早地接受了泰勒制？美国资本的问题很好解释：障碍在于工程工人的技术，这些工人是唯一了解自己工具的人，他们擅长磨洋工甚于实际工作，并且与自己的工会联系密切（工作场所越社团主义、工会联系越密切）。这种障碍只能通过剥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消灭一切工会遗存来实现。操作说明书和等级制晋升是两大武器。这是资本家和不变资本之间的障碍：雇主试图重新掌握机器的秘密，以便使之协调统一，并将之导向复杂的合作制。马克思在讲解合作制时引用的心理学札记在泰勒谈到磨洋工时被提到了。

所以，打破这个障碍是有着高度意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它确是泰勒制的根源。但泰勒主义所选拔的那种工人绝不同于我们所描述的大众工人。泰勒理想中的工人会附属于工厂，但却不会附属于单独一种工作；会非常乐意工作（“在我的体制中，决不能容忍虽有能力但不乐意工作的

人”）；会接受“灵魂革命”；会允许自己日益被剥削。泰勒的工厂不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工厂——那里没有罢工或工人组织形式的空间。泰勒的工人是作为一个劳工进入工厂的，并且二十年后会成长为白领工人。实际上，流动工人（operaiio mobile）正是泰勒视为劣等而试图从自己体系中清除掉的工人类型。他的纲领有明确的精英主义倾向：用一个“工人贵族”替换另一个。这种纲领相应于这样一个阶段：在那时的大规模成批生产系统中，一方面机器持续不断地生产，另一方面又按照某一部门的平均生产率来计算奖金。但这一阶段延续了二十年的好时光——这段时间正好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葛兰西完美地把握了对工人的生理选择；建立生理—体力标准会成为系统干涉工人生活方式的第一步——这种干涉既包括控制酒精（禁酒）也包括性：放荡不羁和一夫多妻的道德适合时光闲散的人，而不适合在工厂工作的人。“美国的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疑问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17] 监督，某些企业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泰勒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

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18] 简言之，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克服过渡阶段，以达到“不同于以前类型的而且无疑比它们更高的新的心理生理关系……一种强制的淘汰将是不可免的；旧的劳动阶级的某一部分将无情地被排挤出劳动范围，或许将被根本从生活中勾销。”^[19] 葛兰西并没有指出，美国的生产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纳粹种族主义的雅利安化计划的先驱——反之亦然——因为他没有看到纳粹的完全形态。我们可以事后来讲，如果接受了这样的分析路径，那么美国的劳动力群众化进程便是通过两个种族选择进程实现的——一个是挑选白种工人中的精英，另一个则是针对黑人。在这里，人们必须面对利用高工资进行说服的问题，只要美国保持对技术的垄断，这就有可能。用高工资将员工与工厂绑在一起，以免人事过度变更。但最重要的事实——正如葛兰西所勾勒的——在于，许多工人因为不愿被过度剥削而拒绝高工资。“福特工业要求自己的工人有其余工业尚未要求的分工和熟练程度：一种在同样的平均时间内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辛苦劳累，都更为使人疲惫的劳动力的消耗量，这些在现存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下不能以工资完全补偿，不能以工资回复。”^[20] 这样看来，在菲亚特的两个关键历史时刻——在我们所涉及的年代里——必须采取

特别管理措施，以防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这就并非偶然。因此，1916 和 1931 年（一战的高潮和大萧条的高潮），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人民拒绝了“菲亚特工资”，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为工作而自杀。泰勒主义种族选拔计划的胜利完成需要时间；但大汽车工厂的需要却更为特别和紧迫。但对这些需要来讲，精英主义公式并不起作用。大众工人唯一的价值尺度是他对过度工作的抵抗。因此，只要大规模批量生产开始，大众工人就会存在于大汽车厂中；起初，他处于生产过程的辅助层面，随后逐渐往上攀登，最终到达生产进程的中心。因此，这个原本是大众工人的特殊工人种族是内在于汽车生产链的，并从那里扩展入其他生产领域。对过度工作的抵抗克服了任何一致赞同的和意识形态的中介，并使一切“灵魂革命”成为剩余。

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会得到解决，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小细节：泰勒制得到了欧洲工人运动和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即得到了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视为劳动力的浪费，并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视为消除浪费的第二国际观点的各种继承人的支持。就此，葛兰西将这种支持（他视之为对苏维埃国家的一种扭曲）的责任归咎于托洛茨基：“列昂·达维多维‘过分’坚决地（从而是非合理化地）希望在国家生活中把工业和工业方法摆得高于一切，以外部的和强制的

手段加速生产中纪律和秩序的建立，使道德符合劳动的需要。”^[21] 将责任转移到托洛茨基身上是一个逃避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在 1926 年，一些老工人核心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捍卫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权力等同于指挥社会主义劳动的欲望。但是随着大批年轻人入党、许多人被赶出乡村，工业化却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托洛茨基的失败（甚至葛兰西也含蓄地承认了）表明了工人对过分要求提高生产率的抵抗程度——年青一代拒绝使自己立刻受到军队、工会和老工人的三重监督。但是，托洛茨基比别人更好地表达了，工业化的“强制”性，社会主义劳动的必要性。

但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构成工人委员会运动主体的工人阶层当中有一定影响。阿涅利自己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试图把这些委员会主义分子拉入经他“选拔”的行列。有时（1924 年）他甚至设法让他们与非专业工人竞赛。而在 1930 年反对贝多体制（Bédoux）的斗争中，这些干部选择消极被动，来作为把自己与“法西斯”青年群众拉开距离的手段，以至党对他们采取了纪律措施。领导这场斗争的是前无政府主义者马卢萨尔迪（Malusardi）。

此外我们能怎么解释共产党工会内顽固残存的反平等性？我们怎么解释布翁齐（Buozzi）与特伦廷（Trentin）

之间的连续性呢？意识形态和大众工人之间的问题因此不是单纯通过说用物理抵抗替代赞同就能解决的。它是手工业工人的第三国际形态，这些工人即便在生产进程的新技术和变革已经横扫这一社会形态时，仍然墨守成规。因此，大众工人承受的意识形态压力，不是来自雇主，而是来自工人阶级传统本身。这或许也能解释，对已被技术进步完全淘汰了的奖金的坚持：尽管在福特从不存在计件工作，但菲亚特却持续至今。

但这种工厂间的区别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削减其他各个直接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在这个面临故意完全雇佣社会的时代中，我们到底是怎么谈论大众工人的？随着危机开始撕裂劳动市场，我们又是如何越来越少地谈论大众工人？这里美国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从贫民窟斗争到失业计划；从妇女斗争到家庭计划——我们认为，在通过评论《管理穷人》（*Regulating the Poor*）一书来开始这一讨论是重要的。在书中我们发现，对穷人（和其他事物，通过控制他们的性生活，就像葛兰西描述福特工人受控的性生活一样）也可能进行筛选淘汰。因此与那些注定保持贫困的人相比，大众工人与工作之间临时和变动不居的关系是一种特权状况。

但城市—工厂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并且与直接工资管理相关的援助管理，实现了一种特有的自治——一种公司独裁下的地方权力的自治。实际上，无产阶级不服从的中心从工厂转向了贫民窟。童工被不良少年替代；妇女纺织厂的剥削被“无依无靠的母亲”的孤立所替代。因此，我们继续将都灵描绘成“美国的”，而美国随时随刻都在转变，并且我们的“美国主义”远不是一种进步观点，仅仅反映了（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白人文化的落后性。

但是这种白人文化，由于将各种贡献集合为一，至少能够公正地、有组织地追溯都灵 / 菲亚特的历史（一段在一定程度上被从意大利史、意大利工业化史或意大利工人阶级史中裁剪掉的历史）。事实上，由于斯普里亚诺^[22]、阿布拉特^[23]和卡斯特罗诺沃^[24]的作品，通过《当代史评论》^[25]（遵循《红色手册》传统方法）的系统工作，我们现在有了一幅相当完整但也面临日益“省份化”（provinciale）危险的当代阶级关系图景。实际上，由于1969—1971年的阶级攻击，菲亚特正在逃离都灵，建立遍及全国各地的结构，并且（或许更重要）“汽车业的衰退”成了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些事实使仍然基于旧菲亚特—都灵、城市—工厂关系的历史分析在“战斗性”方面失掉了许多分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菲亚特的新形式使得整

个历史编纂学传统迅速过时。因此，我们决定发表布龙齐诺、杰尔马内托和圭迪的文章^[26]。不过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米兰这样的事例。对于这个阶级活动非常重要的极点，对于这座城市简短却关键的历史，对于甚至单个雇主，我们并非只能进行一种综合，也并不只有一种“试验性”研究项目。完全一无所有。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一套基本假说——而对于都灵—菲亚特，一切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有一套或多或少相同的基本假说。唯一能说的是消极方面：把所有社会关系还原为工厂关系，将毫无疑问地造成扭曲变形，虽然由于米兰经济部门的多样性（包括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这种变形不过会太过严重。但由于工厂和地域（territorio）之间总体关系的本质，米兰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明显存在一种双重纲领——将（产业部门、商业、同种工厂的）工人阶级战线与零散工人、民众和整个地域结合在一起。生产阵营自身（在社会方面）越是薄弱，地域层面的暴力使用就越为显著。

打破对米兰工人阶级斗争的默杀阴谋是《五一》的目标之一。但有一点必须直言：我们需要替代葛兰西“合理的人口成分”的新运作理念，但不会（运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定义）在那不勒斯（即与工人阶级底特律对立的民众那不勒斯）寻求替代方案。那些想用“社区”替代工

厂的人所做出的这种选择，却使工人主义转变为民粹主义，并将现代贫困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混为一谈。我们也不会办公室或数据处理中心寻求“工厂霸权”的替代方案（米兰白领历史的巨大诱惑）。我们此时会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找寻它。

总而言之（我们终究要回到这里，并且欢迎《阶级》对此提出看法），我们活动处于一般历史编纂学的视野和能够取胜的多数主义命题（就像“工厂—社会”命题那样）内，对于贝尔马尼^[27]在《游击队篇章》（莫斯卡泰利^[28]游击队的历史）一书引言中令人浮想联翩地勾勒的“另一种历史”（*storia altra*）或“小历史”（*Piccola storia*）则兴趣乏然。即便白人青年——白人大众工人——的替代性行为或许会起到主要主体的作用，战斗性历史编纂学也并不意味着地下历史编纂学。

朱 剑 译

[注释]

[1]《阶级》（*La Classe*），意大利左翼刊物。

[2] 《五一》(Primo Maggio), 意大利左翼刊物, 1973 年创刊。

[3] 原文斜体。

[4]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收于《葛兰西文选(1916-1935)》, 第 236 页, 中央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5] 《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 收于《葛兰西文选》, 第 327-328 页, 李鹏程编,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 同上, 第 331 页。原译文中“霸权”为“领导权”。

[7] 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Fiat Mirafiori)位于都灵以南, 曾是意大利境内最大的工业园区。

[8] 原文为德文“Finanzkapital”。

[9] 指意大利能源巨头爱迪生公司(Edison S.p.A.), 总部在米兰。

[10] 意美航运公司(SNIA)是一家意大利航运公司, 总部在米兰, 1917 年成立, 2010 年破产。

[11] 工业重建研究所(IRI)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 1933 年建立的国有公司, 用于接手大萧条中遭受重创的银行在大型工业企业中的股份, 并向濒临破产的私企注资。二战后该公司继续存在, 2000 年方告解散。

[12] 指 1964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

[13] 伦佐·德尔卡里亚(Renzo Del Carria, 1924-2010), 意大利历史学家, 曾加入意共, 后转向毛主义。《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其代表作和成名作。

[14]《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是葛兰西讨论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札记合集，包括《前言》《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工业的财政自给自足》《性问题的几个方面》《“兽性”和工业主义》《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泰罗制和劳动者的机械化》《高工资》《股票、债券、国家有价证券》《美国的文明与欧洲的文明》等。汉语全译收于《狱中札记》，第383—417页，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菲亚特历史日志(1900-1940)》发表于《五一》第二期，正好排在本文之后。

[16]菲亚特公司为阿涅利家族所有，这里指创始人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

[17]此处英译“personal life”，意大利原文“vita intima”。

[18][19]《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收于《葛兰西文选》，第339页，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高工资》，收于《狱中札记》，第410—411页，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收于《葛兰西文选》，第338页，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 1925-1988)，意大利左翼历史学家，曾任意共中央委员。

[23]马里奥·阿布拉特(Mario Abrate)，意大利历史学家，曾撰写都灵工会史方面的著作。

[24] 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 (Valerio Castronovo, 1935—), 意大利历史学家。

[25] 《当代史评论》(Rivista di Storia Contemporanea), 意大利左翼历史刊物, 1972 年创刊。

[26] 指阿尔贝托·布龙齐诺 (Alberto Bronzino)、路易吉·杰尔马内托 (Luigi Germanetto) 和詹弗兰科·圭迪 (Gianfranco Guidi) 三人合著、发表于《五一》第二期 (即本文发表的当期) 的文章《产业工团主义札记: 菲利波·科里多尼与“工团技术改革”》。

[27] 切萨雷·贝尔马尼 (Cesare Bermani, 1937—), 意大利历史学家。《游击队篇章》是他 1971 年出版的作品。

[28] 奇诺·莫斯卡泰利 (Cino Moscatelli, 1908-1981), 真名温琴佐·莫斯卡泰利, 意共著名游击队领导人, 其领导的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北部韦尔切利省的瓦尔塞西亚地区 (Valsesia)。

附录

理论术语注释

工人调查、合作研究

意: *inchiesta operaia*、*conricerca*

英: *workers' inquiry*、*co-research*

合作研究产生于六十年代早期同菲亚特工厂和其他在皮埃蒙特的工厂（奥利维蒂，蓝旗亚）的斗争中，它既是一个研究活动也是一个知识过程，需要在研究者身份和工人主体性之间进行双向转变。作为一种介入的活动，研究者被放置在同研究的主体同一个水平的位置上面，取消了一般左派逻辑喜欢的那种区隔他人的先锋人物。如此一来，它从水平位置上重新调整了理论、实践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形式化成一种方法的活动，即使是在被动的时期，在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阅读非正式组织，以及阅读在阶级的技术构成和它的政治构成之间的断层中的成分模糊性。

阶级构成、阶级分解、阶级重组

意：(de/ri) composizione di classe

英：class (de/re) composition

“阶级构成”是我们探寻革命可能性的核心概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是指资本如何把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并加以利用，即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条件（分工模式、机器的特点等）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具体形式（居住模式、家庭结构、教育制度等）；二、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是指工人把“技术组成”转为武器，用以对抗资本。他们以集体工作的连贯性作为自我组织的基础，从而把生产方式转为斗争方式。（科林科，2001）

对“阶级构成”的关注是意大利工人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阶级构成是处于特定历史关头的工人阶级内在的现象学的、行为的和纪律的组织，受到工作的技术结构、阶级需求的心理模式、政治和社会行动所发生的机构环境以及其他变量相互作用的规定。只有准确理解阶级构成，才能形成有力的工人组织和活动主义。而这样的理解只能产生于仔细的、经验性的

工作社会学研究当中。(摘自《奈格里选集》术语表, 2005)

大众工人 / 群众工人

意: operaio massa

英: mass worker

大萧条 / 新政时期专业工人的瓦解产生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大众工人。通过经历群众性的非技术性工厂劳动和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安全网, 大众工人(较于专业工人)形成了相对非差异化的技术和行为构成。热衷谈判的全国性工会(这种工会重视争取提高工资而非工人控制生产的斗争)和重视参加选举以及党际执政联盟而非民众革命的左翼改良政党(这些政党在六十年代末逐渐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工人阶级行动)是这种构成在政治上的表现。

专业工人

意: operaio professionale

英: professional worker

二十世纪初, 工业生产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人

来操纵和维护构成固定资本的相对简单机械。这些工人因为资本对他们技术的依赖，获得了一定的权威和自主地位，进而构成了工厂等级制中的技术先锋。在俄国，这个阶级的内部构成造就了工厂苏维埃的组织，并最终形成经典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表现。苏维埃和党的等级结构反映了工人阶级自身的等级构成。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资本重新组织生产，从而减少了对技术工人的需要：复杂机械替代简单机械，这样非技术工人便能替代专业工人了。同时，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国家机制的建立将劳资冲突的烈度降低到了可控水平，进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工厂内专业工人技术自主的瓦解造成了政治领域中先锋党模式的瓦解（虽然没有消亡）。

社会化工人

意：operaio sociale

英：socialized worker

社会化工人是阶级构成方面的最新变化，是生产去中心化的结果。奈格里和盟友们在1968年后目睹了这种变化的产生。生产去中心化是资本对六十年代末大众工人国际斗争浪潮的回应，这一重构策略开始打破大工厂，使大众

工人散布于社会的全部空间与时间中，因而有效地瓦解了他们工作纪律的技术构成和表达他们诉求的政治组织（全国性工会和群众性改良政党）。如果说技能和知识规定了专业工人的生产构成，集体纪律规定了大众工人的构成，那么通讯和社交性则规定着社会化工人新式的构成和工作纪律。意大利左翼七十年代的许多讨论（包括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的文章）都着力于考察社会化工人作为一种概念的合法性，以及在理论上探讨替代过时的工会和政党模式的、社会化工人的政治表达组织。

野猫

意: a gatto selvaggio

英: wildcat

“野猫”的罢工、怠工等斗争形式是指没有获取工会领导许可的行动。这个词经常翻译为“自发罢工”，但“野猫罢工”不一定是自发的，而往往是由一些战斗性工人提前计划和准备的。阿尔科蒂在《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中指出：

野猫罢工并非一种由无法通过有组织方式进行集

体斗争的工人所展开的无政府式的抗议形式。相反地，野猫罢工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因为野猫罢工是典型的“一般”斗争形式，所以就因为菲亚特是“全球性的”就把野猫罢工看成是局限于一家公司的内部部门和车间的斗争的有形联合，是非常荒谬的！野猫罢工于15日所取得的首场胜利，这场胜利在都灵之外对现代历史（正因为十分重要，所以这件事才鲜为人知）进行了阐释、去魅和传播，这段历史见证了一个工人组织在菲亚特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够赢得这种罢工：它完全不属于历史上已有的组织和官方组织。

社会工厂

意：fabbrica sociale

英：social factory

由马里奥·托伦蒂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基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工厂一样去管理。这个概念影响了《无产阶级闹天宫》第二卷的每一篇文章；博洛尼

亚在《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中对此作了历史分析。

自主

意: *autonomia*

英: *autonomy*

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也可译为“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他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地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

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强调，虽然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是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自我直接行动。

重要人物、组织、刊物、政党注释

一、人名

罗马诺·阿尔夸蒂（1935—2010）

Alquati, Romano

阿尔夸蒂是最早的工人主义者之一，曾参与《红色手册》和《工人阶级》。他对奥利维蒂和菲亚特罢工的参与和分析，为更为广泛的工人主义分析奠定了关键性基础。尤其是他曾协力介绍了“合作研究”的实践以及未参与官方工人组织实践的工人的“隐形组织”，并帮助人们理解工人主体性。

塞尔焦·博洛尼亚（1932— ）

Bologna, Sergio

博洛尼亚是一名老工人主义者，从《工人阶级》时起就参与其中，对“阶级构成”的理论化和历史政治理解都做出了贡献。博洛尼亚曾加入“工人力量”，后退出并创建了“五一”。通过“五一”，他发展了一套对意大利1970年

代阶级斗争和阶级构成变迁的分析。

圭多·博里奥（1954— ）

Borio, Guido

博里奥是都灵的社会中心的成员。他曾是费鲁乔·甘比诺和罗马诺·阿尔夸蒂的学生，并和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收录他们文章的网站。1970年代，随着都灵菲亚特工人的斗争和社会运动，他参与了“葛兰西团队”及其杂志《红色》。他与弗兰切斯卡·波齐、吉吉·罗杰罗合著有《优先的未来，从〈红色手册〉到全球运动：意大利工人主义的丰富与限度》（2002）。

马里亚罗萨·达拉·科斯塔（1943— ）

Dalla Costa, Mariarosa

达拉·科斯塔是在工人主义潮流内部发展女权主义批判的最重要人物。她曾加入“工人力量”，后离开并创建了“女权斗争”。达拉·科斯塔也是“国际女权主义集体”和“家务有偿化”运动的创建者之一。她今天仍是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1942— ）

Federici, Silvia

虽然在 1967 年离开了意大利，但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著作对于工人主义仍然重要，尤其是对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费德里奇曾是“国际女权主义集体”和“家务有偿化”运动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加入以美国为基地的团体“零工作”（Zerowork）和“午夜笔记集体”（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它们都受到工人主义的影响。她今天仍是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

费鲁乔·甘比诺（1941— ）

Gambino, Ferruccio

甘比诺曾是“工人力量”的一名战士。他在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等地教书，写过有关劳动、移民和强制劳动的文章。他主编了《马尔克姆·X：最后一战》（1993），是《暴风雨中移民》（2004）等书的作者。2012—2015 年，他和德维·萨凯托（Devi Sacchetto）一道主编了三本有关中国工人的意大利语书籍。

塞尔玛·詹姆斯（1930— ）

James, Selma

尽管从来没有以意大利为基地，但塞尔玛·詹姆斯仍作为《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的合著者而得到广泛的尊重。她曾是“家务有偿化”运动的创建者之一。詹姆斯也曾和 C. L. R. 詹姆斯、格雷丝·李·博格斯、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一道，参与了“约翰逊-福里斯特趋势”（Johnson-Forest Tendency），这是早年受到工人主义影响、以美国为基地的团体。

阿尔方索·纳泰拉（1945— ）

Natella, Alfonso

1960年代，纳泰拉从意大利南部移居北部，并在多个工厂工作。作为一名工人，他参加了1969年引发“热秋”的都灵菲亚特工厂野猫罢工。南尼·巴莱斯特里尼的小说《我们全都要》以他的讲述为蓝本。后来纳泰拉写了他自己的小说。他曾是“工人力量”的成员，并继续参与了后来的政治活动。

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 ）

Negri, Antonio

奈格里很早就参与了《红色手册》和《工人阶级》，建立和领导了“工人力量”。奈格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是其对工人主义愿景的关键贡献。

拉涅罗·潘齐耶里（1921—1964）

Panzieri, Raniero

1921年，潘齐耶里生于意大利，长大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战士。1964年他悲剧性地突然去世，享年四十三岁。潘齐耶里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正式党员，1950年代成为该党中央委员和文化事务发言人。后来，他拒斥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工会的合作同盟战略，这一战略企图“有计划地”将资本主义于工厂层面实现的“理性”扩大到全国范围以“发展”意大利。为了在理论上支持自己，潘齐耶里热忱地转向了马克思。一方面，他对扩充马克思文本的意大利语库做出了贡献，亲自翻译了《资本论》第二卷（此书对他理解资本主义起到了核心作

用)；一方面，他用一系列理论阐述补充了马克思的原始文本。这些阐述最初发表于社会党的刊物《工人世界》，后来造成潘齐耶里与党领导层的对立，他被迫从罗马移居都灵。从此，潘齐耶里在与别人共同创办并担任主编的划时代的《红色手册》上发表自己的理论。去世那一年（1964年），他在《红色手册》发表了一篇文章，最清晰但远非最终地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

潘齐耶里对主流改良主义观点的打击，集中于工人运动中最受青睐的范畴（即“无政府状态”和“计划”），并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论点：首先，在社会层面，资本并非单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成了“社会资本”。同样，资本也能进行计划，但这绝不是要否认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规律，抽象的“计划”确实没有什么内在的“过渡性”。他的补充命题是，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计划终究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层面的资本主义计划亦然。主流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视为历史的自动推动力，但潘齐耶里截然相反地指出“生产关系内生于生产力之中”；而对同样流行甚广的技术内在地具有“合理性”的观点，他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工人在生产机制中的资本主义客体性”。

马里奥·特龙蒂（1931— ）

Tronti, Mario

特龙蒂通过《红色手册》和《工人阶级》塑造了工人主义的雏形。这些文章结集为《工人与资本》，阐述了工人主义的一些关键观点。虽然后来与工人主义决裂、回归意大利共产党，但特龙蒂在 1960 年代的写作对工人主义仍然意义重大。

二、工人主义等“院外左派”组织及刊名

《红色手册》（1961—1966）

Quaderni Rossi

创刊于 1961 年的意大利政治刊物，后来成为工人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拉涅罗·潘齐耶里、马里奥·特龙蒂、罗马诺·阿尔夸蒂、安东尼奥·奈格里、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以及达尼洛·蒙塔尔迪共同创建了该刊，其中潘齐耶里起到了核心作用。1963 年 8 月，特龙蒂领导“工人阶级”从中分裂而出，只留下围绕于潘齐耶里和维托里奥·列塞尔的团队运作《红色手册》。潘齐耶里 1964 年去世后，这份刊物继续发行到 1966 年再告停刊。

在《闹天宫：意大利自主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构成和斗争》一书中，史蒂夫·赖特评论道：

潘齐耶里刊物第一期于 1961 年下半年面世，在意大利劳工运动当中造成了巨大的波澜。随着初版在数周之内一售而空，《红色手册》引起了左翼政治家、工

会官员、工作场所活动家和基层党员的兴趣……但从一开始，它就被一系列危机所困扰。首先是组织中最杰出的工会分子分裂而出；一年后，特龙蒂的圈子步其后尘。接着在1964年10月，在一些内部秩序终于得以恢复时，刊物始料未及地遭受了潘齐耶里之死的打击，从此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完全可以将所有参与过刊物最初几期的人标记为“工人主义者”——毕竟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犯有将工厂视为斗争重心的罪过……但随着团体内部日益增长的对立迅速明朗，对一种新政治实践的共同信念变得远弱于对阶级行为的不同解释，这分裂了《红色手册》编辑部。事实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工人主义潮流是随着“工人阶级”而全面爆发的……将《红色手册》头三期比喻为孕育了许多经典工人主义的中心主题的培养皿是更为恰当的。

《工人阶级》（1963—1967）

Classe Operaia

赖特在《闹天宫》中称，这份刊物从《红色手册》中

分裂而出标志着“工人主义发展之经典阶段的开始”：

《工人阶级》依靠某些核心特征团结了它的所有同仁：将工人阶级视为被纳入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强调工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坚持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推动力。

这个新团体在罗马和威尼托最为势大，《红色手册》在那里几乎遭遇了彻底的背叛；其他地方的情况（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的分裂）则更没这么幸运。因此“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其分配于不同工人阶级聚集区（尤其是北部）的政治力量和它自身在其中的干涉能力之间的不平衡。

特龙蒂的文章《列宁在英格兰》（潘齐耶里以“太过黑格尔”为由拒绝在《红色手册》上发表）成为《工人阶级》创刊号的编者按，并被视为整个工人主义的宣言。

对于这份刊物的解散，赖特评论道：

早在 1965 年，特龙蒂……就曾论述称，像“工人阶级”这样的团体的存在，是劳工运动当时缺陷的症候，只能是短命的。……（与之相反，）北方人的政

治组织方法继续聚焦于坚持和扩大生产内部斗争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在产业冲突再次加剧的时候，罗马人对集中制的强调是不对的。《工人阶级》最后一期延宕了整整十二个月才在 1967 年面世，而此时已发生了严重的两派对立。

“工人力量”（组织及同名刊物，1969—1973）

Potere Operaio

一个受工人主义影响的院外组织，同时也是一份主要由激进学生和对官方工会对资本主义管理的有限挑战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主要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行的改良政策不抱幻想的大工厂工人参与的刊物。奈格里是《工人力量》的创建者之一，并自始至终是其首席理论家。1970 年代初的意大利工厂重组严重地削弱了传统工厂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而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女权主义运动）提供的批判和替代方案造成了“工人力量”在 1973 年的解体。

在《闹天宫》中，赖特写道：

如果“工人力量”曾是……经典工人主义的具体

表现，那么它的困难也能说明 1960 年代的理论及其在工人主义者手中的实践尝试的缺陷。……“不断斗争”领导层 1972 年 10 月的文字表明，……他们的团体与“工人力量”分享着同样的重要信条：只有首先与第三国际传统决裂，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党。即便这一部分确实如此，但同样确实的是，对“大众工人”前景的看法上两个团体存在着长期分歧。“工人力量”认为，……1969 年“热秋”之后，大众工人的前景看上去远非光明。失望于当时工厂中的战斗性未能在政治上明确挑战资本的统治，“工人力量”开始重新考察阶级构成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考虑它的核心范畴（即大众工人）的意义所在。……

奈格里在其《计划国家的危机》（该文是“工人力量”1971 年 9 月三大的预备性文献）最为精致地表述了“工人力量”用广泛的无产阶级替代工厂工人的新理论。

对该组织的解体，赖特评论道：

在 1973 年中旬解体之前，“工人力量”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就已经因为内部对立而陷于瘫痪。再次讨论

大众工人的政治意义时，团体中的一批人继续鼓动放弃使用这个范畴。讨论开始前不久，一位匿名人士在《工人力量》1972年2月号发表的文章中坚称，工人主义在理论上已经陷入死胡同。……既然被工人主义置于“技术构成”和“政治构成”之间的传统理论认为，随着资本关系扩张到工厂之外，会形成一种“更为庞大并且更为多产的”形式，那么旧的概念装置便越发没有用处了。……“工人力量”描画的先锋队图景被奈格里的《计划国家的危机》撕得粉碎。面对国家的行为变得“偶然而随意”、并且其仅仅出于憎恶和“阶级生存的绝望意志”而继续资本关系，只有回到列宁主义关于起义的问题才能使群众斗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阶级行为和政治组织功能的意义方面，也存在深刻的分歧。1973年，“工人力量”名存实亡。当奈格里的同仁们转而拥抱新生的“自主领域”时，他们的敌手却使组织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尽管最初对于奈格里的圈子或模式鲜有同情，但这股政治潮流也曾要被拖入“自主”运动。其他人则走上了特龙蒂的道路，回归共产党内部战斗。……但各种情况下，1960年代最有价值的教益（即对工人阶级行为的仔细研究）

都将或多或少地因为政治急躁和日益死板的概念装置而被牺牲。至 1970 年代中期，很少有人会将劳动人民自身各部门的变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工人自主”（由诸多团体、刊物组成的运动，1973
—)

Autonomia Operaia

又名“有组织的自主”（Autonomia organizzata），有时直接简称“自主”。在 1970 年代初，“工人自主”替代“工人力量”，成为当时意大利诸多社会和政治运动中最具对抗性、最暴力（尽管不是恐怖主义式）的运动之一。自主主义者坚信工厂工人自始至终作为革命主体的重要性，但他们也承认，其他吸引着意大利新一代战斗分子的斗争领域（包括性别、性向和种族）具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因此，“自主”较于“工人力量”在理论和事件上都比较分散。“工人力量”解体后，奈格里加入“自主”并撰写了几份讨论其组织方案的小册子。其中，“社会工人”（这是关于弥散在成为“社会工厂”的全社会的新无产阶级的假说）概念影响尤甚。1970 年代末，“工人自主”的地位被更新的运动所替代；它也和这些新兴运动一样，主要是被国家

的直接镇压和集体判刑而摧毁。

在《闹天宫》中，赖特称“自主”是“意识形态多元、地域分散、组织流动”：

从未是单独的组织，更不用说武装团体的群众组织（正如某些法官后来指称的），自主主义组织和集团的“领域”在意大利极左翼那里一取得了领导权之后，就迅速地分散开来。……

“自主”在1973年3月第一次凝聚成一个特定的政治实体。那时，数百名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战士汇集在博洛尼亚，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步骤，以结成一个新的全国性革命左翼组织。其中许多人曾加入“工人力量”、追随奈格里，但大部分被“工人力量”日益参与工会和机构政治所激怒，放弃了这个极左翼团体。大会的导引性报告描述了当时的危机形势……“唯一可能的道路是进攻。”此外，进攻只能建立于新老左翼试图模糊的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阶级需求之上。为了表达这些需求，组织要直接根植于工厂和社区，要根植于既能够促进由阶级自身直接管理的斗争、又能够恢复“传统组织已然摧毁的无产阶级权力意识”的实体。……

(自主主义杂志)《红色》(在1973年)写道,它的政治并不围绕着“男性、成人、正常、不受制于感觉和情绪”的抽象工人,……它寻求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可以通过“资本自身表现的工厂和生活的奴隶制”,检视性和情绪控制的问题、家庭的本质和那些被认为“不正常的人”的边缘化的问题。……

对所有院外左翼的大规模镇压在1979年开始,数千名活动家被捕下狱,大部分运动解体。1980年代末,“工人自主”开始复兴;当时,被占领并改造成“社会中心”(centri sociali occupati)的空间开始在主要的意大利城市蔓延。新的“自主”相当不同于1970年代的“工人自主”;承继性体现在运动结构、自由电台、一些长期占领的社会中心以及奈格里这样的知识分子方面。

“不断斗争”(组织及同名刊物,1969—1976)

Lotta Continua

“不断斗争”于1969年11月成立,1976年11月解散。最初占组织多数的是受1969年菲亚特斗争鼓舞、希望和工厂工人建立联系的学生和前“工人力量”成员。它

吸引了未加入各大工会的工厂工人。“不断斗争”起初相当松散，后在 1970 年代初转变为集中制的组织。该组织出版有同名报纸，后者一直存活到组织解散后的 1982 年。

“女权斗争”（组织，1971—1979）

Lotta Femminista

“女权斗争”于 1971 年 6 月成立，一些创建者（如达拉·科斯塔）曾加入“工人力量”。“女权斗争”对发展工人主义批判、深化工人主义的再生产和劳动批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国际女权主义集体”和组织“家务有偿化”运动方面，该团体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一》（1973—1988）

Primo Maggio

这份杂志继承了早期工人主义刊物（如《红色手册》和《工人阶级》）关注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工作场所状况和阶级构成变化的传统。塞尔焦·博洛尼亚、切萨雷·贝尔马尼、阿利萨·德尔雷、达拉·科斯塔、费鲁乔·甘比诺和许多人都曾参与该刊的编辑和写作。

三、主要工会联盟

1950-1970 年间，意大利工会呈意总、意劳联和意劳盟三足鼎立之势。这三家工会都根据相应产业划分为各个“部门”（比如，意总—FILTEA 便是纺织工人“部门”）。

意总（意大利总工会）

CGIL（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

意大利总工会曾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会组织，在 1968 年有会员二百五十万人。在意总各级组织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势力强大，占比分别近乎 2 / 3 和 1 / 3。

意劳联（意大利自由劳工联合会）

CISL（Confederazione Italiana Sindacati Lavoratori）

意劳联曾是意大利第二大工会组织，在 1968 年有成员约一百五十万人。它于 1948 年从意总分裂而出，常年受

到基民党人的控制，尽管它的基础不在教会。

意劳盟（意大利劳工联盟）

UIL（Unione Italiana del Lavoro）

意劳盟曾是意大利第三大工会，在 1968 年有盟员约五十万人。其领导层中，社会党人、社民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别占比 45%、30% 和 25%。它是冷战期间由反共分子从意总当中分裂出来的。

四、主要院内政党

天民党（天主教民主党）

DC (Democrazia Cristiana)

天民党是 1948—1994 年间意大利的执政党，党员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尽管其政策倾向为自由资本主义，但支持者却遍布不同阶级。1968 年 5 月，天民党得票率为 39%，在众议院中占有二百六十六席。

意共（意大利共产党）

PCI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意大利共产党曾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天民党其次），1968 年有一百五十万党员。意共在 1968 年 5 月的选举中得票率 27%，赢得了一百七十七席。它曾于 1945—1947 年入阁，其他时候则是主要反对派。

意大利社会党

PSI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社会党是意大利的第一个工人政党，但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削弱。1947年，一个社民主义集团从社会党中分裂而出，后在1966年重新加入该党，1969年再次分裂出去。1968年，社会党和社民党联盟得票率为15%，获九十一席。社会党曾于1963—1972年间入阁。

“意社运” (“意大利社会运动”)

MSI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意社运是由老法西斯党和保皇党合并而成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主要活动于意大利南部。在1968年的选举中，它的得票率为4%，在议会中赢得了二十四席。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PSDI (Ital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意大利社民党是冷战期间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右翼反共劳工政党，曾参加执政联盟。

编后记

我们分三卷编选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流派（operaismo）及其女权批判的核心文本，它们都来自阶级斗争和政治论战在意大利蓬勃发展的1960和1970年代，而且是首次翻译成汉语。

第一卷开篇是对当年曾参与工人主义团体论战的费鲁乔·甘比诺的访谈（2018），接着是他的学生圭多·博里奥特意为我们编写的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及工人主义大事年表，这能为读者导航，有助于理解之后的一系列经典作品。第一篇是拉涅罗·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1961），其中质疑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中立”性和“社会主义”运用的理解；第二篇是罗马诺·阿尔夸蒂的《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1964），为理解意大利工厂新兴的阶级构成发展了新的概念和工具；最后，马里奥·特龙蒂的《列宁在英格兰》（1964）呼吁从新视角看待资本主义和革命，并要求首先观察工人斗争的发展，

然后再分析争取资本发展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

第二卷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计划国家的危机》（1971）开始，这篇文章阐释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对于社会各层面的渗透；《政府做老板 工人也能反》（1972）是意大利国有汽车厂阿尔法·罗密欧的工人“自主大会”撰写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该厂1971—1972年的罢工事件；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翻转》（1972）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偏重于工资劳动，强调妇女斗争以及（大部分是无工资的）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政治小册子《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1974）要求承认妇女劳动，并推崇激进地重新定义性别关系；塞尔焦·博洛尼亚的《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1974）对建立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历史编纂学做了探讨。该卷末尾是两个附录，第一个简要地解释了工人主义相关的部分术语，第二个介绍了参与当年斗争和论战的部分个人和团体及其刊物，还有当时意大利的主要工会和政党。读者可以在其中寻求检索第一、二卷中的术语和名词。

第三卷包含了作家南尼·巴莱斯特里尼根据阿尔方索·纳泰拉个人叙述创作的小说《我们全都要》（1971）。

纳泰拉是一名来自南意大利的移民工人，参与了菲亚特汽车厂的野猫罢工。我们截取了最近对阿尔方索·纳泰拉的访谈片段《“它是我的故事”》（2018）作为附录。



